

MUSSOLINI AND FASCIST ITALY

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意大利

[英] 马丁·布林克霍恩 著

译文世界史丛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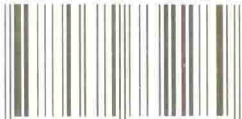




(第二辑) 目录

- 《宪章运动》
《西班牙的民主和内战(1931-1939)》
《拿破仑三世和第二帝国》
《英国与英国外交(1815-1885)》
《冷战(1945-1991)》
《尼禄》
《希特勒和纳粹主义》
《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意大利》
《黎塞留和马萨林》
《科学革命》
《地理大发现》
《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

ISBN 7-5327-3228-2



9 787532 732289 >

定价：9.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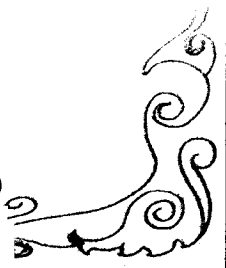
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意大利

[英] 马丁·布林克霍恩 著

吴 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意大利/(英)布林克霍恩
(Blinkhorn, M.)著;吴杨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2003.12

(译文世界史丛书)

书名原文: Mussolini and Fascist Italy

ISBN 7-5327-3228-2

I.墨... II.①布...②吴... III. ①墨索里尼, B.
(1883~1945)——生平事迹②法西斯主义——研究——意大利
IV. ①K835.467=5②K54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1844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译文世界史丛书(第二辑)

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意大利

(英) 马丁·布林克霍恩 著

吴 杨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市吴中区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4/32 印张 3.75 插页 2 字数 58,000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册

ISBN7-5327-3228-2/K·128

定价:9.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历史：与人类记忆相衔接

——“译文世界史丛书”总序

顾晓鸣

我在1989年左右主持翻译过一套“社会科学概念丛书”，十几万字一本，近20种。聚焦于人类社会和当今世事最关键却又最众说纷纭的概念，如《民主》、《自由》、《财产》、《种族和族类》、《科僚制》等，对世界上的研究成果作要言不繁的综述，貌似通俗，但理论含量达到专著水平，前沿信息超过正规大学的教科书。普通上班族和大学生读来，分析能力骤然提高。究其原因，知这套丛书系英国开放大学专为开放教育和终身教育编辑。如今见到这套“译文世界史丛书”，顿有老友重逢之感，同样出自英国大学之手的这套书，不足十万字一本，聚焦于人类历史上一个个“最关键的人物、事件、制度”，娓娓道来，讲故事似地一以贯之。细心揣摩，发觉小书一本，五脏俱

全；术语有原文匹配，定义阐释得当，史料专门排出，表图一目了然，加上参考书目，添列其后。这架式无疑又是一种“开放大学”读本，融修身怡情和研读学习于一体，是英国人及其学者人文精神和科学态度之绝妙显示。读这类书，方知“现代化”社会不媚俗不媚雅的“大众读物”该是何种模样。

英国作为资本主义革命的先驱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因此，普通上班族的业余学习和全民的开放性大学教育尤其发达（正在实施全国统一联网，向全民开放远程教育）。就如原为士绅专利的“爵士”称号已授予平民一样，精英的知识正切实地采取独创而有效的方式，“授”予普通劳动者。

一本小书，其中包含的“阅读的革命”，我们不要小觑了！

“译文世界史丛书”的选题结构和文体都是非常独到的，她对于历史阅读和写作的意义更是值得关注。

20世纪末已露历史热的迹象：包括《角斗士》、《伊丽莎白》、《雍正皇帝》、《太平天国》在内的红极一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以及诸如《还珠格格》那种借历史人物场景演现代戏、而收视率创新高的通俗作品，更不必说充斥书市的大量怀旧的读物了……历史，事实上正成为著作界和读书

界的最爱。

被中学教学和教条式的历史著作坏了心情和阅读欲的广大读者,在另一种历史书籍中发现了历史的价值和魅力。

但是,那些滥情甚至滥写的“历史文艺”和某些同样滥情甚至滥写的“历史自述”,有可能使“历史热”面目全非,因为我们跑遍全市书店竟找不到一本正经八百叙述“长征”之类本国历史重大事件的著作。真正雅俗共赏的严肃历史读物在此间已寥若晨星。

如今,在你的面前,“译文世界史丛书”推出了一种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既可读又可写的历史读物。可读,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都可以无障碍地读下来,津津有味。可写,有历史研究兴趣的读者在其中品味晚近研究成果,可以在其基础上作延伸的思考和探索。

这是“译文世界史丛书”传递给我们的新世纪的信息:作为阅读主体和世界主人的普通读者,正经历教育、学习和阅读的革命,步入大学和研究院的殿堂。后现代社会也罢,知识经济时代也罢,网络时代也罢,其重要的标志是作者和读者,知识的创作者和知识的接受者之界限的打破,作者和读者平起平坐,相得益彰。因此,这类面向普通的非专门从事研究的人们的“准学术”读物,深入浅出将会大量出现,它

们合乎全民大学习,个人终身教育的大趋势,也合乎专门博览各科的通才培养和素质教育的大环境。我之所以把“社会科学概念丛书”与“译文世界史丛书”相提并论,一方面在于它俩都出自英国学者之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祈盼国内有更多的出版社从方方面面的问题,形形色色的学科入手,来做这样的提高普通劳动者文化水准的学术工作,而不要让“热门”和“炒作”乱了自己方寸,倒了百姓胃口;不要使“书市”“书城”太有书摊味和小报相。当然,曲“高”和寡的学术著作也要通过这类著作的编撰,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现代学术民主和大家风范。

这套书毕竟是历史读物,然而它还不仅仅是与诸多学科并列的一科。恩格斯说过,他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科学。历史是人的存在的见证,是人的经验结晶,是一切科学由此发生发展的最大的“孵化器”。别的不说,如今订规划,做管理,都讲究 Vision。这个词台湾学者译为“愿景”,已在大陆通用,其实在史学中也译为“异象”,即与众不同的眼界。这种 Vision 来自什么地方?当然,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修养的人,可以借助理性的推导,产生对未来社会和市场的预见,但后现代科学的思路却告诉我们,真正另辟蹊径,出人不意的 Vision,只能产生于历史的库藏,就如今日新药的开

发和新的药理的发现,需要在以往的、古代的甚至原始的“单方”里找线索一样。

史学名家柯林沃德(1889—1943)有一段名言说:要认识自己,就要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但人无法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除非曾经做过;因此,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别人已经做过的事。

历史是什么?是故事,过去的事,用文本告诉你的“别人曾经做过的事”。英文中的历史(history)和故事(story)也是同词根的,这种与可以无穷复制的信息相对应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这种与统计和公式相对应的符合人文思路的叙述描写,这种与逻辑和推理相对应的独特事件,是血与汗的经验,是知识的本真。

这种取之于别人独特经验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洞烛人性的幽深和世事的奇谲,因为历史的本质正是它的永远的临界性:历史的人事总是超越人们的推理和计划,冲击知识最深刻的功能是赋予一切无名的人们以历史感,而正是这种参悟天机的历史感觉,使“无名”成为“英雄”。历史使无名的卑贱者成为人类进步的主人,多少故事其实都是在叙说着无名者创造历史的伟大业绩。历史给每一个普通人以英雄的自信,完整的历史叙说一定能使人类每一分子都平起平坐,安身立命,得其所哉。

在这种态势中,这套“译文世界史丛书”切切实

实地为我们提供了世界史、主要偏重于欧洲史的详尽知识材料：历史人物如亚历山大大帝、路易十四、彼得大帝等，无不与其相关的思潮、政制、事件、时代，联系交融相互发明；而历史事件，则取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视野，具体而界限分明，如宪章运动等等；取宏论精如“雅典民主制”等；追根寻源如“一次大战起源”等；还有跨度更大的题目，如复辟期的英国、“冷战”，甚至某一朝代的穷人问题之类。通过这种立体的交汇，犹如多重的神奇灯光使史学之神克利奥现出真相。具体一本书的不足或偏颇，通过这种相互匹配，得到弥补。

在内部结构方面，这套书根据不同题目，多样而统一，并吸收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史学史和历史书写的成果，以叙述体为主，辅之以各种有利于展示历史面貌的不同文体和表达手段。以《雅典的民主》为例，这本书对作为西方民主制的渊源之一的古希腊民主，按时间顺序作详尽的历史论述，由此抽象变为具体。读者对人云亦云失之泛泛而谈的“民主制”的印象和理解，变得具体而强烈，知道了梭伦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了解了阿瑞奥帕戈斯会议等一系列重要组织，弄清了“公民权”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懂得了“陶片流放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制度，掌握了“将军”、“行政官员”、“屯垦区和殖民地”等一系列具有特定涵义的历史名词。书中的各种地图，雅

典四大财产等级的简略适当的列表,某一时期地方编制的详尽个案,以及雅典大事年表和包括古代文献在内的丰富的参考书目,使这样一本篇幅不大的著作蕴含丰富而扎实的史学内容。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普通读者在阅读和使用时,一定兴味浓浓,益处多多。中国史以前也出过“历史小丛书”之类,但失之于将“普及”理解为“简单”,如能受此启发,推陈出新,编出有中国特色的、包含更多非西方国家内容的新的“历史小丛书”,定能别开一番生面。

正是这样的历史故事,抵御了世界的一级化、社会的单一化、人生的平面化、文化的霸道化。过度的理性和智商、定律和规则,是世界单调之渊藪。后现代对现代的抗拒,其中一条,就是冲破“逻各斯”的霸权,在人类无限丰富的历史中,在各民族的文化中寻找知识和道德的源泉。所谓“后卫风格”(“前卫”、“先锋派”的对应词),就是与“现代”和“传统”保持等距离。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人的全面知识=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历史是栩栩如生的,本丛书所选的各书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直观的直觉的经验性又是图像化时代的最瑰丽的图像,在新的世纪,将有无数的人物和故事进入影视、绘画、音乐、文学和旅游胜地,主题公园、家庭装潢和收藏,成为今日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存在的一部分。历史故事亲证和亲历的案例性,又将使之进入法律、经济、金融、管理等实

践领域,成为印证理论,寻找契机的创意库;最激进的未来学家已经预言人类社会正从第四种形态即“信息社会”进入第五种形态——梦想和故事的社会,21世纪人类的家园,包括饭店、百货公司、街区都将“故事化”,而历史凝聚着我们父辈和邻人劳作和奋斗的一切,是我们眼下生活着的世界的“故事”源泉。

用历史和故事来阐述哲理,解析法律,驾驭经济、管理,推进改革……一句话,来影响和促进全社会和每个个人的生活和福祉,将成为新世纪的著述盛况。

历史和故事溢出书本,流布世间,凝为建筑和公园、街市和家居,将成为今日文化的最大景观。

所以,一个雄辩得无需强词夺理的结论:一切渴望生命和生活的多样化和丰富性的人们,一切企盼事业和人生的创造性和成功的人们,都应该热爱历史。

用什么方式把历史的片断镶接起来,重现人类的记忆,使之衔接成为具有人类智慧的个体智者?

这是一种纵向的互联网,这也是历史在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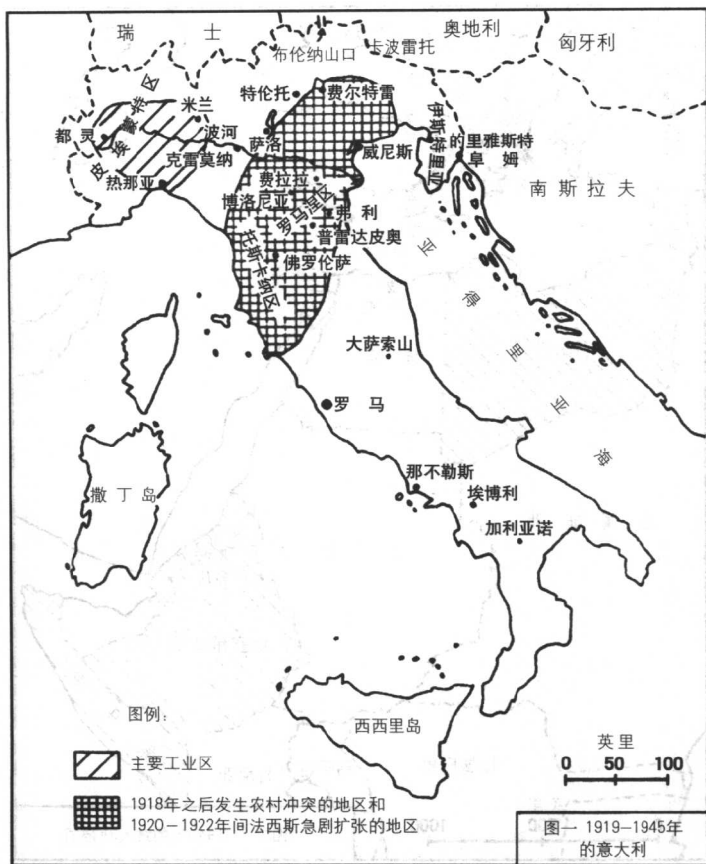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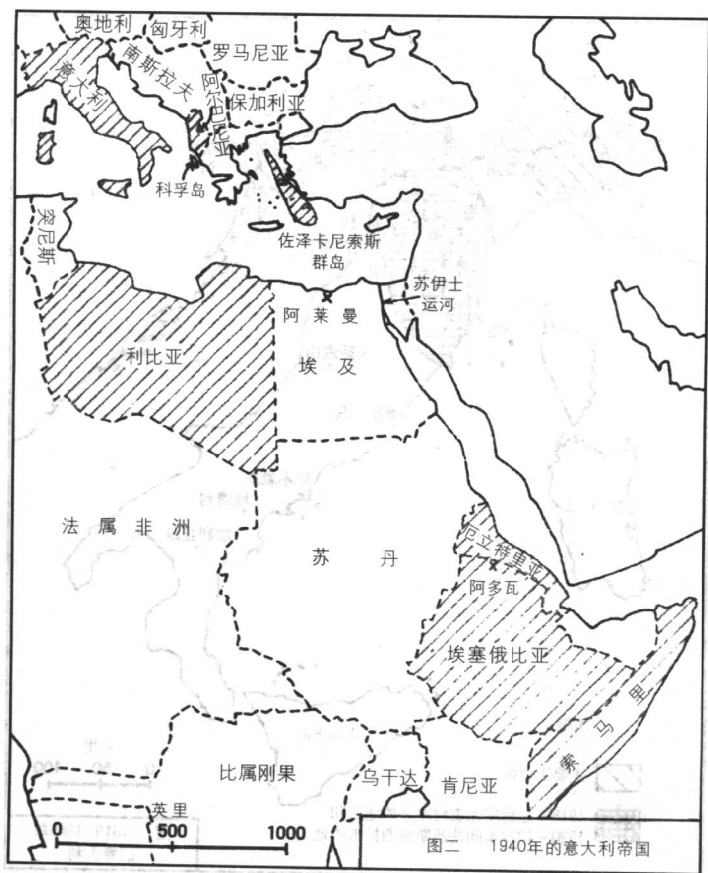


图 2

目 录

图一： 1919—1945 年的意大利

图二： 1940 年的意大利帝国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背景：自由主义的意大利，1861—1915	4
第三章	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16
第四章	夺权，1919—1925	28
第五章	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	39
第六章	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	49
第七章	外交与帝国主义，1922—1936	60
第八章	法西斯主义的衰亡，1936—1945	70
第九章	解读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81
结 论		91
附 录	大事年表	93
参 考 书 目		100

第一章

引言

罗马那些风格各异的建筑遗迹常常使现今的游客们想起过去的那些世纪和那些瓦解了的政权：如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统治。但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在各处还可以找到另一个逝去的政权的痕迹，虽然年代较近，但与其他政权相比它似乎更遥远，更容易被人遗忘；例如，通往意大利奥林匹克体育场的道路两旁，那些已经损毁的石柱和破碎的马赛克图案纪念着曾经划时代的军事胜利，颂扬着一位逝去的“领袖”。这位“领袖”就是贝尼托·墨索里尼，而把他的“功绩”刻在石头上的，就是那个在 1922—1943 年间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



法西斯主义在当时的欧洲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许多右翼追随者都认为,它是一种爱国力量的自然爆发,一旦当政,必然取代无能的议会制的自由主义和危险的左翼革命,为国家带来秩序、效率和民族自豪感。但对于它的反对派来说,这些成就显得肤浅,甚至根本不存在;在他们看来,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对反对派实行流氓政策和暗杀活动,以及在权力上进行压制:一个腐败的政权加一个自大狂的“领袖”,压制自由言论、自由集会,以及其他政党和工会,其目的越来越带有帝国征服的味道。如今,尽管在英语国家中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和特质的讨论可能仅限于学术圈,但在意大利本土,由于这段法西斯统治岁月在时间上的贴近,相关的一些学术讨论时常见诸于大众媒体,因此也吸引了更多民众的关注。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呢?它在意大利出现并获得政权的过程及原因又是什么呢?它是如何执政,其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以上就是本书力求发掘并尽可能予以回答的主要问题。随后你会发现,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非用墨索里尼一个人就能解释得了的,不管他的作用有多大;而它也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场资本主义的阴谋,或是罗马人的一场不合理的暴乱。它可以算做 1918—1922 年战后危机的产物,但其意义又远非如此。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需要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同样,它的夺权需要一个适合其进入的政治真空状态。夺取政权后,法西斯主义对恶劣的国内局势提出了它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它所奉行的外交政策令其最终声名狼藉。要想了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各个方面,我们必须首先考察法西斯主义在其中出现并始终无法完全摆脱的社会背景:1861年诞生的“自由主义的”意大利。

第二章

背景：自由主义的意大利， 1861—1915

自由主义的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

18 59—1870年间，意大利王国得以统一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有部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有外国势力的影响和介入，还有建立统一的意大利——皮埃蒙特——的梦想的综合作用。当时，民族主义运动性质的意大利政治复兴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留下了一个复杂的局面，这里有两条主线需要我们关注：一，它在政治意识颇强的意大利人中引起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即认为意大利马上就要强大和繁荣起来了；二，在形成一个既无民众参与又非为民众谋福利的新国家时，它提出了一套

漏洞百出的社会政治体制。

这个新的国家实行的是一种君主立宪制，是自由议会体制和中央集权统治的结合体，作为一个皮埃蒙特化的代表，它从一开始就遭到很多人的憎恨。首先，人民的民族意识水平不平均，大多数农村人和外省人的民族意识淡薄；其次，还有人依然效忠于覆灭的旧王朝并各自为政，而数百万农民只看重身边的那一块土地，任何外部势力在他们看来都是入侵者和潜在的剥削者。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地方主义越发严重：意大利南部的许多地区土地贫瘠，生活贫困，与进步发展相脱节。梅特涅曾说过，意大利不过是个“地理概念”；如今它更像一个政治概念。就像皮埃蒙特的政治家阿泽利奥所说的那样，“我们塑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该塑造意大利人了。”

自由主义政治的运行反映并且加深了这个新政权同它的人民之间的距离。19世纪末期，自由主义的根基尚浅：1870至1881年选举改革期间，近3200万人口中只有50万男性意大利人获有选举权，从那之后到1912年的第二次选举改革期间，选民从200万增加到300万。1870年后的30年间，政治实权主要控制在意大利复兴运动中崛起的中上层阶级手中。这些人被称为“政治阶级”，他们之间的派系之



分不在于各自的信仰和阶级不同,而在于个人的恩怨和各自效忠的地区不同,所以他们把意大利视为一种并没有明显的政党界限的议会政治体制。首相和议会大臣们奉行“多数派变化论”,给各议员和他们的选区各种特权,不断拉拢着更多的人来信仰他们的主义。1881年改革前后,所谓的大选就是各地方党派和政治“首脑”行贿受贿、暗箱操作并威逼选民。因此,议会代表的是政治阶级本身和与政治阶级在家庭、地方和经济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这些人现在被称为“受庇护者”。议会的无代表性随着意大利天主教徒的态度的改变变得更加明显。1860—1861年间这个新兴的意大利王国吞并了教皇的领地,并最终于1870年占领了罗马,这使得教皇对它采取了敌视的态度;所以直到该世纪末,大多数虔诚的天主教徒都拒绝参政。

自由主义政治准确地反映了占意大利绝对比重的农村社会的现状,它的特征是传统的农耕方式、高文盲率以及淡薄的政治意识。所以,只要这种局面不发生太大变化,自由主义就能顺利且无所顾忌地展开。然而,当这个绅士俱乐部式的世界受到瞬息万变的局势和新兴社会政治力量的挑战时,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意大利和整个世界局势，1861—1896

人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统一后的意大利并没有在国际社会上自动强大起来。患得患失的意大利人承认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和普鲁士，对意大利的统一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有的时候，他们也憎恨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带着这种复杂的情感，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对于意大利作为“强国中的最弱国”的地位极度敏感。意大利本可以安于其二等国家的地位，这是由于她贫瘠的自然资源、落后的经济和建国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但是意大利复兴运动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和 1870 年后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使得她反倒学起了“年轻的”德国，努力想挤进大国之列。

爱国的意大利人觉得意大利复兴运动没有进行到底，因为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地区的大批讲意大利语的人们还在受奥地利的统治。夺回这些失去的领土是意大利领土收复主义者们的梦想，这个梦想一直持续到 1918 年。但是由于意大利野心勃勃地加入到远离本土的非洲战场，所以各届自由主义政府都未能实现领土收复主义者的统一愿望。考虑到



在突尼斯和亚历山大等地大量意大利人的存在,以及 19 世纪初意大利商人和传教士的足迹曾遍及世界各地,再加上罗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扩张历史带给意大利人强烈的自豪感,种种因素使得很多像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1887—1891 和 1893—1896 期间担任首相)这样的人确信,意大利必定能再一次扮演帝国的角色。但是意大利经济薄弱又缺乏海外输出所必需的金融和工业财富,所以帝国主义者只能狡辩说,殖民地能提供意大利繁荣所需的财富,从而结束她所谓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局限”,同时还可以为数百万的意大利人提供“意大利式”的移民选择——到南美和美国去。他们故意忽略了这样做的危险,那就是征服、保护并管理殖民地将耗资巨大,从而会使他们亏本。

尽管大多数早期的意大利领导人对意大利帝国的前景抱有怀疑的态度,这是因为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形势始终对他们的不利。1881—1882 年间,法国占领了突尼斯,英国在实质上控制了埃及,这使得意大利在北非的野心遭到重创。在以后的 30 年里,只剩下不算肥美的利比亚还吊着意大利“非洲殖民梦想”的胃口。

意大利在北非的失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首先,对法国在突尼斯政变的恼恨使得意大利最终在

1882年与德国和她的夙敌奥匈帝国建立了三国同盟。其次，帝国主义者的目光开始转向东非。1885年意大利吞并厄立特里亚，随后在1889年占领了索马里的部分地区。然而，像克里斯皮这样的帝国主义者的目标是在整个或部分埃塞俄比亚建立起自己的保护国。他们的梦想破灭了，1896年在阿多瓦，意大利人被埃塞俄比亚军队打得一败涂地，5000名意军丧生，2000人被俘。在很多意大利人的眼里，阿多瓦战役并没有动摇他们的帝国梦想，倒是使他们开始怀疑自由主义制度到底有没有能力实现他们的帝国梦想；在他们心中，建立东非帝国的梦还在继续。阿多瓦战役之后40年，法西斯主义使他们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民主政治的挑战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意大利经历了一次迟来的，但意义深远的变革。曾经使意大利经济普遍滞后的农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化机器的引入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富饶的波河流域，随着农业的繁荣出现了一批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大量的



农业劳动力和介于两者之间的重要的地产商和技术师；而在其他地区，如托斯卡纳，农业的近况越来越糟，贫苦的佃农和小佃农（即根据契约被迫将收成的一部分，经常是一半交给地主的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米兰、都灵和热那亚所形成的西北地区，伴随着迅速工业化的进程，其重工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了起来：如钢铁、冶金、造船和汽车、电子和化工。到1914年，北部地区出现了一批显赫的银行家和工业家，他们紧密团结，共同对外。工业化产生了一个新的、虽然还是有地方局限性的现代工人阶级，此外还产生了另一个“新兴”的城市阶级：在意大利发展迅速的城镇里，由于教育投入的增加，产生了一批小中产阶级，他们急于加入到管理、官僚和白领阶层中，以竭力拉开同无产阶级之间的距离。北部的这些发展恶化了它和中部的关系，两者产生了矛盾，而这一矛盾又极大地推动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意大利南部的经济发展远远赶不上北部和中部。早期自由主义政府一直回避的“南部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而拉大了南北之间的差距，变得越发不可收拾。南部大批无法充分就业的农村人口纷纷移民至美洲和北非；到1914年，意大利的总人口是3500万，其中有500—600万人移居海外。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经济落后、社会政治生活停滞，民众不过是自由

党政客操纵竞选所需的选票而已。在变革迅速的地方自然会带来新的政治变化。1881年的选举改革主要使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得到了选举权，结果是对这些城市的竞选操控变得比自由党政客预想的要棘手得多。一些参选的激进派、共和党人代表，他们批评自由党的怠惰，并要求更多的议会席位。1892年，意大利社会党(PSI)成立；虽然它所赢得的选票有限，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还一度被取缔，但它很快就壮大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进入下一个世纪后，在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某些地区，如西西里和阿普利亚，社会党(在有些地区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工会得到了工人和农民越来越多的支持。当时社会党发展的社会背景是：19世纪90年代，社会普遍动荡，有些地方劳动者对现状极度不满，对此，意大利政府，尤其是在克里斯皮和鲁迪尼任首相期间，采取了镇压政策。为了回击唯物的、“无神论的”社会主义的挑战，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们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不再采取与世隔绝的立场，他们积极参与，并着手建立自己的工会。

自由主义和议会制度要想在意大利生存下去，它的政治体制和政府首脑就必须学会顺应社会的这些变化。但是趋于保守的自由党不愿接受议会日益增长的专断，也不去发掘产生社会不满和动荡的根



源。19世纪90年代,尤其是1898—1900年间,政治和军事上的保守派试图挽回政府的威信。结果,由于他们的无能、胆小和真正的自由、民主人士的坚决抵抗而失败了,但是保守派不愿支持真正的议会民主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有威胁的。

然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们开始制定计划尝试着使自由主义制度顺应新的潮流。其策划者就是在20世纪前20年里叱咤风云的自由党领袖乔瓦尼·焦利蒂。一战前焦利蒂被三度选为首相(1903年11月—1905年3月,1906年5月—1909年12月,1911年3月—1914年3月),其在卸任后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他分别通过公正地解决劳资纠纷和缓解自由党多年的反教会态度,将两股新兴的、颇得人心的势力——社会党和天主教会笼络在议会旗下。有些批评家指责焦利蒂只关心他自己的位子,即便如此,他的战略至少使更多的意大利人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并且使自由主义得以渡过了大变革的时代。因为天主教领袖们与日俱增的实用主义和社会党领袖中由来已久的反对激进的态度,再加上1901—1907年经济回升的大环境,焦利蒂的政策得以顺利施行。1912年,焦利蒂的选举改革使选民增加了3倍,达到近900万,几乎是一夜之间使全国男性都得到了普选权。然而之后他的战略就起不到什

么作用了。1907—1908年经济发展的速度缓慢下来，1911年，焦利蒂从迅速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到了对利比亚的控制权。这件事使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称心如意，却疏远了大多数社会党人士，并从而增强了意大利社会党日渐强大的左翼力量。在社会党反对利比亚战争的激进分子中就有时年28岁的贝尼托·墨索里尼。1912年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全国大会上，左翼革命派取得了政党的领导权。1913年大选时，社会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后出现的社会罢工和各种近似革命的活动都暴露了焦利蒂政绩的局限性：即意大利自由主义仍未解决大众政治的出现所带来的问题。自由党人的机会已然不多了。

自由主义的批评者

国家的耻辱和社会党的崛起激励了意大利少数活跃的知识分子抨击自由主义，旨在感染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例如诗人加布里埃莱·邓南遮，以其诗抨击自由党的腐朽和对武力的颂扬，使读者心潮澎湃；菲利波·马里内蒂领导的未来主义学派，是一个文学、艺术和半政治性质的流派，他们歌颂武力、



现代科技和战争。这种动荡最典型的政治形式就是意大利的民族主义。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成立于1910年,领导人有意里科·科拉迪尼和后来法西斯国家的缔造者路易吉·费代尔佐尼和阿尔弗雷多·罗科。民族主义者将意大利的经济落后和国际地位低下归罪于政治阶级的软弱和腐败、自由主义本质上的缺陷和科拉迪尼所说的“可耻的社会主义”的分裂影响,他们倡导独裁政府、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他们主张,在意大利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各阶层的团结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力,并通过帝国主义的扩张,使其成功地挑战英法这样的“财阀统治阶级”的国家。

虽然民族主义者获得的民众支持不算很多,且主要来自于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但他们与保守党、天主教会和商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他们虽然完全是右派政党,却又与左翼分子取得了共识。20世纪初,从社会党中脱离出了一个流派,即“革命工团主义”。工团主义运动在1914年前遍及大部分欧洲,它反对通过政党和议会进行政治活动,支持革命的工会主义。意大利工团主义革命家埃德蒙多·罗索尼与社会党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战略,认为工会不仅是一个革命机构,还可以作为建立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到1914年时,一

些工团主义者步子走得更远了。他们确信社会党和意大利无产阶级都无法取得革命的成功，他们认为意大利的痼疾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而在于政治阶级，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必须要号召包括工人和有雄心的中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的“生产力”，发起革命，推翻现有的自由主义制度。工团主义的立场与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并不一致，但出于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仇恨，他们走到了一起，从而孕育了法西斯主义的萌芽。

第三章

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战时的意大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主要参战国当中，意大利就其参战还是保持中立，在国内引起了一场公开的争论。这场争论给意大利的政治结构以沉重的打击。中立主义者多数都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包括了多数社会党人、天主教徒和焦利蒂领导的自由党人。主战派却是鱼龙混杂、派系林立。其左翼方面有革命工团主义者、持不同政见的（主要是南部）社会党人，以及各类激进派、共和派和民主派。他们和其他派别如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者认为，意大利投身到英法民主政治所代表的进步力量

中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更为革命的主战派来说，意大利的参战还有另外一个诱惑，就是战争对于国内的影响能够消除社会和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主战派的右翼有保守的自由党人和民族主义者，后者抑制住自己对德国独裁统治的羡慕，希望通过与英法联盟获得东北一带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奥地利领土，并打垮衰落的土耳其，夺回中东的殖民地。而加入到德意奥三国同盟作战的主张几乎没有人支持。很多保守派，比如1914年3月就任首相的萨兰德拉，与更具革命性的左翼截然相反，希望通过参加这场他们觉得会很快结束的、必胜的战争，使日渐分裂的意大利人民重新团结起来。1914—1915年的冬天和初春，这场辩论更加激烈了。1915年4月26日意大利签署了《伦敦密约》，加入到英法同盟中。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开战前征得议会的同意还是很重要的；差不多历时一个月，议会在5月20日对参战表示全力支持。意大利主要城市的大街上人声鼎沸，到处是民族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组织的游行，在他们的授意下，各小队自称为法西斯革命军。“法西斯”这个词原指为某种政治目的而集结的一群人，在这里它具有了一种左翼的含义，使人想起19世纪90年代西西里左翼的革命活跃分子。法西斯革命



军是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次有组织的预兆。行动队队员们认为,意大利得以参战都是他们的功劳,但实际上重要的参战决定都是由保守派,如首相萨兰德拉和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作出的。

战争的耗时耗力超出了多数保守主战派的预期。正如左翼主战派早就预期的,这场战争对意大利的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 590 万意大利男子应召入伍,其中 400 多万被送上意—奥边境的交战区。伤亡是惨重的:50 多万将士阵亡,60 万被俘,100 万负伤,其中 45 万人终身残疾。意军的步兵大多是农民,很多人是第一次远离自己的家园,出来为国效力,至于所维护的国家利益,他们几乎无从知晓。结果到后来,他们为意大利事业而战的满腔热情都消失殆尽,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怨恨越积越深,既怨恨那些把他们送上前线、又让人看不到任何最终物质回报的冷酷的统治阶级,又常常怨恨中立的意大利社会党,以及该党所代表的大多可以免服兵役的产业工人。在社会和军队士官阶层中也存在着怨恨的情绪。战争期间新任命了约 14 万名军官,大多数是年轻又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不管最初对战争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前线培养出了一种强烈的战友之情,他们

一致支持战争和扩张，同时对国内的政客开始不信任，这种情绪在后来的和平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战争还使意大利本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最为显著的就是与军备紧密相关的那些工业快速增长和高度集中了：冶金、工程、造船和汽车。如果有人觉得繁荣将持续下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意大利的战争机器只消耗一种工业产品，并且其消耗速度是和平时期的经济根本无法比拟的。如果再考虑到产业工人阶级越来越壮大，其工会组织越来越强，那么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一个扭曲的经济，潜在着原材料短缺、缺乏出口渠道的问题，又没有一个健康的国内市场支持，自然会造成战后的种种困难。战争的主要受害者——那些归来的士兵们，看到自己在前线浴血奋战时别人飞黄腾达：不光是金融和工业投机商大发国难财，连有点野心的农民也趁此机会购置了更多的土地，心理怎么能平静。同时，政治环境也越发让人沮丧。中立派的焦利蒂置身局外，战时的三位首相——萨兰德拉、保罗·博塞利和奥兰多——先后主持政府事务，但都难以服众。对很多意大利人来说，自由主义政府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落后于潮流了。

1917年10月，由于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惨遭失



败,战争危机到来了。几周之内意军就有1万人丧生,30万人受伤,30万人被奥地利军队俘虏,奥军攻入意大利——原先是奥地利的领土——境内70英里。这次大败虽然在战争尾声时的维托里奥威尼托一役中得到逆转,但却极大地震动了民心,在士兵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士气,也促使了政府赶紧展开一场迟到的宣传运动。政客们重申对民主的承诺,农民军也得到了迟来的保证,保证战后能得到土地并改善待遇。另一件与卡波雷托大战同时发生的事可能也刺激了政客们痛下决心:即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战后危机

意大利的战后状况很快就证明,形势根本不像1918年官方宣传所鼓吹的那么乐观。她的经济遭受了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危机的重创:1918—1919年食品和原材料短缺;始于战争时期、持续到1921年严重的通货膨胀;1920年初,250万复员军人回家,导致失业率迅速上升。

意大利政治体系遭遇以上问题的同时,还得面对大众政治时代的突然来临,而其原来的做法和人

员显然无法与之相适应。为了实现战时的民主承诺,1919年的大选采用了比例代表制,这种制度对现代政党比对传统的特权政治更有利。在竞选中脱颖而出的两大政党是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人民党,后者是一个天主教党派,1919年成立,得到了梵蒂冈的认可,但在政治上又独立于梵蒂冈之外;该政党的领袖是牧师路易吉·斯图尔佐。意大利如今的民主未来就掌握在这两大政党手中了;两个政党都无力独撑大局,若两党联盟或许可以将意大利带入一个真正的民主时代,可是虽然社会党温和派和人民党左翼有共同的立场,但社会党左翼和人民党右翼互相敌视,其结果根本无法达成一个改良主义的联盟。权力又回到了原来的自由党手中,四位自由党人——尼蒂、焦利蒂、博诺米和法克塔——在战后到1922年10月间担任首相。他们在任的这三年证实了自由党领袖在应对已经转型的政治环境方面实在能力有限。

有两个首要问题令战后政府束手无策:社会动荡和民族主义者的怨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罢工和“非法”占用土地的现象开始影响工业和农业,这种势头在1918—1920年间红色的两年里达到高潮。这一时期,工会会员猛增,社会党劳工总联合(CGL)会员从25万激增到200多万,人民党联盟成员从



16万增加到116万人。在社会党和农村的左翼人民党的带动下,整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工厂工人、农村劳动力和穷苦农民个个斗志昂扬。在西北部的工业区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和托斯卡纳的农业区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很多保守的意大利人并不认为这场斗争是长期加速变化和战后困难的结果,而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的开始。社会党左翼的恫吓当然会造成人们的恐慌,然而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没有苏维埃的鼓动,革命不大可能发生。1920年8月,红色两年的高潮到来,工人占据了意大利北部几个城市的工厂和造船厂;运动被瓦解后,工人和农民的斗争热潮就开始回落了。

现在,富有的农业和工业雇主们的反击机会来了。战后,意大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各届政府自1901年以来在劳资纠纷中对他们的不公,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的利益集团决心不再忍受,他们开始寻找一种新的控制资本、劳力和国家三方关系的办法。此外,原来富人中的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得到了无数中下层阶级人民的支持,因为社会党垄断了他们在地方上的就业机会,更有甚者,由于社会党左翼对战后各阶层的退伍军人采取了不明智的、公开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敌对态度,致使其支持者纷纷离去。

很多退伍军人和其他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意大利人在感情上认同战争和扩张的战争目标,这就引发了战后政府的第二层问题。1919年,战后意大利的所获甚丰。她的夙敌——奥匈帝国解体,意大利的东北边界扩大到布伦纳山口,在亚得里亚海岬,她还吞并了的里雅斯特城和伊斯特拉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但人们相信这是一个“残缺的胜利”,因为她未能得到非洲和中东的殖民地以及亚得里亚海周围其他的土地。1919年9月,诗人及冒险家邓南遮带领一群意大利退伍军人从四国临时占领军手中夺走了亚得里亚海城市阜姆,轰动一时。邓南遮的摄政政府控制了阜姆达一年多,其公然挑衅国际秩序的行为,在意大利民族主义狂热派和非社会党的革命者中被广为传颂。邓南遮政府的“风格”,即它的游行、口号和在阳台上的演讲演变成了一种模式,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所推崇;它的“生产者的国家”的宣传也同样受到欢迎。到焦利蒂于1920年12月最终将邓南遮逐出阜姆时,这位革命诗人已经成了意大利人心中的英雄和未来的领袖,意大利人急于一雪“残缺的胜利”之耻,在不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屈服的同时打垮自由党。而另一个这样的人物,当时还不如邓南遮那么有名,他就是贝尼托·墨索里尼。



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的形成

1883年,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涅的一个小城镇普雷达皮奥附近出生。该地区的反叛传统在他父亲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的父亲是一个支持共和党和社会党的铁匠,墨索里尼继承了他的世界观和性格。墨索里尼想从事教育事业,但表现平平,几次暴力事件又为他的履历留下了污点,但他在1902年还是当上了一名教师。从那时起到1910年,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在两度不成功的教学经历中,他在瑞士呆了两年(1902—1904),做过临时工,有时到处流浪;后两年(1904—1906)则回到意大利参军。从1908年开始他才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做了一名左派记者,先是在奥地利统治下的特伦托工作,后来到了罗马涅的弗利镇。1910年,他当上了当地社会党报纸的编辑和弗利镇社会党组织的书记,开始在弗利的社会党内建立起个人影响,并以此为跳板,于1911—1912年一跃成为该党激进派的代言人。他反对利比亚战争并同焦利蒂合作,一时在全国家喻户晓。作为社会党1910—1914年左倾路线创始人之一的墨索里尼,1912年担

任了社会党主要日报——米兰《前进报》的编辑，最初他忠实地坚持党的官方路线，反对意大利参加欧洲战争。然而到了1914年10月，他就已经转到“积极的中立”立场上，对法英两国表示同情，到年底时，公开支持参战了。结果他被迫辞去《前进报》编辑的职位，并被逐出了意大利社会党。他的那些主战派同盟们有的成了革命工团主义者，有的成了未来主义者，还有的成了激进的共和党和右翼民族主义者：这种古怪的组合被他后来溶合成了法西斯主义。

的确很难解释像墨索里尼这样一个人在开战前还是社会党人和国际主义者，却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爱国战争的倡导者。就像他对弗利的罢工工人的热心支持一样他最初信奉社会主义是发自内心的；同样他对民族主义的公开批判也是出自真心的。但是，他的社会主义表现为极为个性化的东西，在他生活中，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接近革命工团主义或是暴动的共和主义，而且，虽然他极力反对民族主义，但他的视野从本质上讲还是局限在意大利这个民族内的；他自愿从瑞士回国参军并认真服役就可以证明，在他国际主义的外表下有一层不为人知的爱国激情。或许他的政治生涯的关键是他对眼前的这个意大利恨之入骨，并拒绝参与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阶层。他的恨主要是针对意大利



狭隘的自由党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恨把他变成了社会党，而他的革命目标与其他社会党人所向往的革命后的社会不同。墨索里尼就像一个激进的工团主义者，面对 1913—1914 年的国内外时事，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于意大利是不适合的。在国内，社会党于 1914 年 6 月举行了一次“红色周”的暴动，结果失败了。墨索里尼从这件事看出社会党斗争的局限性，他确信，无论是社会党还是意大利的工人阶级都无力革命。在国外，1914 年欧洲工人运动的表现破坏了他原来对国际工人阶级团结抱有的信心，也使他了解到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得人心的力量是有很大潜力的。这两重认识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左翼参战派的观点，认为意大利参战虽然会导致一场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会推翻自由主义制度，并将一个新的阶级推上统治地位，而这正是他要为之献身的。

然而，当时的前景并不好。虽然墨索里尼在参战派和法国人的资助下很快就出版了一份新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但战争的真正开始却转移了原先公众对他的关注。墨索里尼参战两年——其间他因伤退役——之后又回到报界。随后的两年，他回去做了《意大利人民报》的编辑，投入到发展和宣传一种新的、从长远意义上讲非常高明的全国革

命战略中。到战争结束时,《意大利人民报》已经放弃了它原来为社会党服务的宗旨,转而为“生产者和士兵”大声疾呼,反对自由党的寄生虫和不爱国的社会党。但在当时这种声音并没有多少听众。战争结束后,社会党权倾天下,墨索里尼这个社会党的叛逆苟存于意大利政治生活的边缘上,一筹莫展。然而,他是不会长期这样下去的。

第四章

夺权,1919—1925

城市法西斯主义和农村法西斯主义, 1919—1921

19 19年3月23日,几乎被人遗忘了的墨索里尼主持了一个新政治运动团体“法西斯战斗队”在米兰的成立仪式。参与这一不为人知的事件的118人主要由退伍军人、未来主义者和像墨索里尼一样叛离原党的左翼分子构成。法西斯战斗队的名字还要追溯到1915年参战派的法西斯革命军,墨索里尼曾徒劳地希望保留住它作为战后革命的工具。法西斯这个词以前是左翼的专用词,现在在右翼更常用,因为对于右翼人士来说,它象征了罗马共和国长官的权杖,是“团结获得力量”的意思。

然而新的运动团体表现出的左翼思想与工人阶级支持的社会党形成了对立。它的纲领是共和的、反教会的和民主的,它主张分权、妇女选举权和比例代表制,将剩余战争收益充公,让工人参加各种工业管理并管理公共设施,使军工厂国有化,实行最低工资和8小时工作制以及取消帝国主义。最终证明,这一纲领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起什么作用:1919年11月大选中,法西斯主义者在米兰——他们惟—较大的基地——27万5千张选票中只得到了不足5000份选票。到1919年12月,很多左翼分子离开了法西斯战斗队,并且邓南遮取代墨索里尼成为“民族工团主义”未来可能的领导人,此时法西斯主义面临崩溃。然而,墨索里尼并不就此放弃,一些有钱的米兰人预感到法西斯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潜力,于是给墨索里尼提供经济援助,从1920年夏天起,法西斯战斗队进入了其崭新而又重要的发展阶段。

法西斯主义复生最重要的因素是在多数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村的”法西斯主义的成长,尤其是在波河流域和托斯卡纳,从1918年起,社会党联盟和人民党农民团体就威胁着土地所有者和“中间”阶层的地位,尤其是富农、地产商和各省城市的专业阶层。在省会城市如博洛尼亚、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法西斯基地开始执行一项法西斯行动队组织



的政策,即命令法西斯黑衫党对社会党和工会主义的团体、设施和军事力量采取武力行动。这些暴力活动最初规模很小,但随着新成员的加入逐步升级。接下来的两年里,法西斯的讨伐成了家常便饭。左翼党派、社会党联盟和人民党农民团体的办公楼、左翼报社和印刷社遭到洗劫,并且频繁地被纵火烧毁;左翼和工会活动家遭受大棒和刀枪的暴力和羞辱,还被强迫吞食蓖麻油。黑衫党和警察当局关系融洽,不当班的警察经常来加入他们的行动,因而战绩显著。从1920年秋天到1922年夏天,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社会党和人民党农村工会组织几乎都被打垮了。随着罢工活动和工会组织成员的急剧减少,法西斯党迅速膨胀,党员激增;到1922年时,除南部以外,几乎每一个省都有一个势力庞大的法西斯党组织,分别由各自的首领领导。首领们背景不同,有克雷莫纳的罗伯托·法里纳奇、博洛尼亚的迪诺·格兰第和费拉拉的伊塔洛·巴尔博等人,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执掌大权,独立于墨索里尼的领导。虽然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南部还相对薄弱,但谁能想到,法西斯党两年前还不足1000人,但到1922年中期已经在全国拥有了超过25万党徒。

这时的法西斯党表现出它独特的社会特性。法西斯党头目和活动家都是从战争退伍军人中招募

的,尤其是那些前下层军官和军士;还有来自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城市的专业工人和白领工人、农村的中上层阶级——土地所有者、富有的农民、有产者和农场主、地产商和他们的下一代——而这才是最重要的。法西斯党原来想吸收的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并没有真正自发地支持它;但随着左翼组织的倒台,很多贫苦农民和一些工人完全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加入了法西斯和它刚刚建成的工会。富有的农民要么入党,要么就给予越来越多的道德和经济上的支持,与之相比,工业家的支持不那么热烈,但他们也很乐于看到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被法西斯摧毁或削弱。

法西斯党员越来越多,他们想从法西斯主义中获得些什么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对于打过仗和因年龄太小未能参战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让他们在战后枯燥和无聊的世界里感受到了同志友谊和刺激;对于政治意识颇强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在和平时期战争的继续,因为意大利现在的敌人是社会党人和自由党“叛徒”;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以革命推翻自由党统治下的意大利的陈腐的统治阶级,代之以一个新的、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精英集团,这些人在反对意大利国内外敌人的战斗中日渐强大,从而有资格领导政府。



进军罗马

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壮大,其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反动了,当然在言词和自我形象上并不一定如此。它对社会名流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对此,自由党人也并非无动于衷:在1921年5月大选中,还算不上政党的法西斯战斗队加入了焦利蒂的反社会党的“民族主义”集团。当选的35名法西斯代表组成了议院最右翼的势力。法西斯主义的右倾势头是无法遏制的:1921年夏天,本不愿意完全切断与左翼联系的墨索里尼试图与社会党达成妥协,但他本人的政治立场使他放弃了这种做法,所以法西斯党和社会党之间非公开的内战一直不断。1921年11月,任何关于法西斯党的政治方向和权力欲望的怀疑都消除了——原来的法西斯战斗队现在成了政党——法西斯国家党,该党公开其右倾政策,奉行独裁、自由贸易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路线。

一年之内墨索里尼就当上了意大利的首相。有人认为,法西斯国家党掌权是因为1922年10月法西斯国家党挺进罗马的所谓“革命”的神话。但是,法西斯国家党掌权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保守力量。

1922年在梵蒂冈、天主教集团、“自由党”知识分子和报界人士、工业家和农业界中形成了一种概念,即法西斯主义必须参政。不仅焦利蒂,还有他的保守党对头萨兰德拉、首相法克塔和其他自由党领袖,此时都希望吸收法西斯国家党加入政府,希望通过参政能使法西斯主义驯服、“转变”,并最终被吸收到自由主义体制中来。自由党政客除了能与最谦和的社会党或者斯图尔佐和人民党合作以外,跟谁也合作不了。他们没有任何创意,只能屈从于同法西斯主义的妥协。在政界以外,商人和农业界喜欢法西斯主义的实实在在的的反社会主义性质,希望法西斯加入政府,从而使政府对劳动者的态度更加强硬;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则希望法西斯主义能够给已经枯竭的政府注入新鲜活力;梵蒂冈在1922年2月教皇庇护十一世当选后,也希望法西斯进入政府,从而结束政教之争,并对教会作出重大让步。

各种保守派的利益集团只看到要法西斯参与这个旧式政府,并没有往长远上想,他们越是觉得法西斯参政必不可少,就越无力抵抗法西斯首脑们酝酿已久的最终夺权。1922年8月,社会党组织的一次反法西斯大罢工失败后,法西斯施加的压力就更大了;该年10月,他们开始制定挺进罗马的暴动。虚张声势是计划的关键。法西斯虽然支持者甚众,但



实际上真正能参加行动的不足 3 万人,并且装备简陋,一旦政府反抗,军队听从皇家的差遣,暴动会被轻松剿灭的。无论是全军溃败,还是胆小撤退,都将会使法西斯主义泡沫破灭。结果倒是当局为墨索里尼铺平了道路。首相法克塔见法西斯在各省开始动员,决定予以打击,10 月 27 日他要求国王签署戒严令,命令士兵镇压将要发生的暴动。国王一开始同意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变了卦;没有人知道他的理由,也许是他担心军队会支持法西斯,也许是害怕内战,也有可能是对法西斯参政的必然性听天由命了。法克塔当即辞职;由于墨索里尼拒绝加入任何非他领导的政府,结果,他于 10 月 29 日被任命为首相。到这时候,法西斯主义挺进罗马才真正开始了。

独裁之路,1922—1925

意大利现在有了一个法西斯首相,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一个法西斯政府。墨索里尼主持了两年的联合执政政府,各主要大党都在内,除了社会党之外,后来,人民党也被排除出去。1922 年 10 月时,法西斯主义的前途尚不明确,它是临时的还是永久性的,是最终“正常化”还是举行真正的革命,针

对这些问题,法西斯主义与支持者们尚未达成明确共识。

墨索里尼当然不想放弃已经到手的大权,或许他希望通过对现行制度进行重大修正,而非彻底革命来保证自己长久掌权。这样做会令保守党支持者满意的,对他们而言,一个由法西斯领导的政府是件好事,但政府完全由法西斯控制却会令他们不安。在大多数保守派看来,一旦权力的天平对左翼、工会和下层阶级不利,最理想的就是政治“正常化”。在那之前,他们是不愿行使手中的权力把墨索里尼拉下马的。自由党政客还做着“正常化”的美梦,拒绝采取对墨索里尼不利的行为,希望他会自己犯错,这样大权就又会回到他们手中。然而,局势变得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他们的支持者,尤其是南部的支持者纷纷转向法西斯国家党。表面上,对墨索里尼更具威胁性的是人民党和左翼分子。然而前者在1923年第一次被清除出政府后就四分五裂,后来又遭到亲法西斯的梵蒂冈的疏远,而后者在法西斯黑衫党的不断进攻下,再加上工会成员减少,温和派、激进派和共产党的不和,势力日渐减弱。

1924年夏天时,主动权虽然还不完全在墨索里尼手里,但终于落到了法西斯主义手里。这时的法西斯党是一种不稳定的联合,其中有五股力量十分



强大：首领和黑衫党急于进行“第二次革命”，进一步扩大他们和他们所代表阶级的力量，至于夺权的实际目的他们不清楚，也不关心；法西斯“左翼”，原工团主义者，如罗索尼和米凯莱·比安基，他们希望法西斯能取替“旧的”左翼，建立起一个能够唤起民众力量和热情的“民族主义—工团主义的”国家；法西斯“专家治国论者”，如朱塞佩·博塔伊，他把法西斯看作是一个精英的、现代化的力量；民族主义者在1923年与法西斯国家党联合时，就希望能指导它向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而法西斯保守派渴望着“正常化”，并维持社会政治现状。墨索里尼最大的问题来自于黑衫党，因为在这个尚未统一的法西斯国家党内，真正的实权不在领袖手中，而是在各省的首领手里。他们提出法西斯全面接管政府的要求，这令在各保守派中间小心周旋的墨索里尼左右为难。他一方面希望加强对首领和他们混乱的手下的管理，另一方面他要利用这种混乱来警告其敌人和伪装的朋友，如果不服从将会发生什么。墨索里尼通过将黑衫党统一为国家法西斯民团，并创建法西斯大议会，把首领们辖制在自己手下。这样，墨索里尼朝着建设一个更具纪律性的政党前进了一步——虽然进步很小。

墨索里尼要加强法西斯政党地位的决心很快就

表现出来,1923年7月通过的选举改革法案,阿切尔博法案(Acerbo Law),目的是要使他领导的政党和同盟在大选中获得议会的三分之二的席位。1924年4月的大选中,法西斯的官方候选人获得了66%的选票,在535个席位中,赢得了374个。在南方,1922年10月以前法西斯主义还影响微弱,现在该党可以运用惯用的操控选举机器来保证选举的胜利;在北方,由于竞争还算自由,左翼分子得到了很多选票,这令政府不安,同时也说明,即使在自己的大本营里,法西斯的统治也并不彻底。

选举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法西斯暴力,所以当议会重开时,这一点遭到了强烈的抗议。而此时议会内外的法西斯党徒们正忙着为反对派制造麻烦呢。最突出的例子是社会党温和派成员贾科莫·马泰奥蒂;1924年6月他被一群法西斯分子抓走并被刺死,尸首直到8月才被发现。法西斯暴徒的罪行被揭露后,墨索里尼即使没有实际串通,但至少在道义方面他是无法躲过责难的。

马泰奥蒂危机后来被证明对于法西斯政权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在一浪接一浪的反法西斯情绪中,很多社会党、人民党和共和党反对派都退出了议会以示抗议:即所谓的“阿文廷事件”。墨索里尼坐立不安,如果国王要他辞职,他会辞职的。但是国王



没有这样做,这显示了保守派的弱点,即使在这种时候依然不愿意放弃墨索里尼,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左翼复兴的恐惧,另一部分原因是想利用墨索里尼的软弱来增加他们对他的影响。自由党虽然 1924 年末也加入了反对力量,但是没有保守派的支持,反对党和自由党都无济于事。墨索里尼因此保住了地位,但现在他又面临着党内的兵变。首领们,官方称作“执政官”,认为在这场危机中不应对反对党让步,而正应该借此消灭反对党。1924 年 12 月他们集体要求墨索里尼下定决心实行专政,否则就罢免他的法西斯国家党领袖之职。1925 年 1 月 3 日,墨索里尼向现有的议员们表示,独裁统治正是他自己的意图。

第五章

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

领袖、政党与国家

19 25—1926 年独裁统治得到巩固,期间共出现了四次谋杀墨索里尼的行动,均告失败,但这几次暗杀活动对政权的稳固十分有利。1925 年 12 月政府颁布一项法律,授予墨索里尼主理一切的大权,这种特权配合高压手段之后更加有力了。政治反对意见和自由工会被禁止;新闻单位被迫接受审查,最后被法西斯全面接管;选举产生的当地政府成员被墨索里尼任命的官员所取代;通过加大政府逮捕和拘留的权力,扩大死刑执行的范围,建立一种为政治犯设立的特别法庭,组建“秘密”警察(镇压反法西斯活动的志



愿队),意大利具备了成为一个警察国家的各项条件。

以上种种措施强化的不是法西斯党的权力,而是国家和“领袖”的权力,墨索里尼正可谓权倾天下。这些措施的主要策划者是两个原民族主义法西斯党徒:1926年11月卸任的内务部长费代尔佐尼和1925—1932年任司法部长的罗科。他们两人在为法西斯窃取国家政权时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支持,但他们同法西斯党内本身的其他一些分子相敌视。法西斯国家党内局势依然不稳定。其中最叫嚣的党员是那些顽固的黑衫党,最著名的代表是罗伯托·法里纳奇。法西斯的黑衫党们从“民粹派”的角度看待法西斯主义持续的集会和讨伐,对“领袖”与党员之间近似神秘的、假民主的关系深信不疑,他们渴望法西斯能夺取国家大权,尤其是国家的镇压机关。这些人的喧嚣和暴力排斥了其他法西斯分子:例如,兴趣不在发展政党而在发展法西斯工会的原工团主义者以及博塔伊那样的老谋深算的专家治国论者,后者希望法西斯党作为培养未来意大利领袖的温床而存在。或许,更多的人从1920年开始支持法西斯主义是出于保守的或者机会主义的原因,对他们而言,法西斯国家党只意味着个人发展的手段而已。

1925年1月,墨索里尼任命法里纳奇担任党的书记一职。因为他本人非常憎恨法里纳奇,并且两

人对于如何处理党与国家的关系持全然不同的意见,所以这项任命就显得格外明智。由于法里纳奇继续要求将国家法西斯化,他为法西斯国家党中央集权所作的一切同时也破坏了各省党部头目、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权力和独立性,削弱了他所代表的黑衫党的实力。到1926年4月被迫辞职时,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法西斯国家党中的异己分子也已经差不多被驯服了。法西斯国家党的新秩序被正式地写入1926年10月修改的党的章程里,按照党章规定,“领袖”第一次被明确为该党的最高领导;同时,法西斯大议会保留了理论上制定政策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党的职位都不再选举产生而是由领袖来任命。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墨索里尼的明确要求下,法西斯国家党服务于国家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了,法里纳奇之后的继任者,党的书记奥古斯托·图拉蒂(1926—1930)和乔瓦尼·朱里亚蒂(1930—1931)多次对“旧卫士”型的强硬派进行肃清,更强化了这一特点;这两位任期间,共有17万法西斯党徒——基本上都是“旧卫士”型的——被清除出法西斯国家党。法西斯国家党的大权越来越集中在像博塔伊和图拉蒂这样的人手中,他们渴望建立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政党,即便不能吞并整个国家的话,至少也要创造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来。



但是,博塔伊和图拉蒂在致力于这个活跃、奉献和专业化的政党的时候遭到了挫折;1933年末期,法西斯国家党党员达到140万,到1939年超过了260万。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国家党已经成了一个趋炎附势的、培养野心家的恶性膨胀的官僚机构,极度缺乏政治独创性。在3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1931—1939),担任党的书记的阿希尔·斯塔拉切是真正的代表人物:他对墨索里尼惟命是从,只关心宣传和游行,完全不理睬政治和社会的创造力。法西斯国家党的这种状况反映在党员的社会特点上。1921—1922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法西斯党员是工人和农民,而到了20年代末党员就都是些不可靠的、野心勃勃的公务员、专业人士和白领工人了;在南部的一些地方,公务员占了党员总数的75%—80%。法里纳奇担心,法西斯国家党一旦失去了黑衫党的活力,将堕落到一种安逸的中年阶段,结果,他的担心得到了完全的证实。

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可能因此是一个一党制国家,但决不是像纳粹德国那样的“党国一体”。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法西斯国家党在政权中的地位无关紧要。除了为中下层人民创造就业机会以外,它做了很多重大的管理和政治的教育工作:试图培养意大利年轻一代的法西斯主义精神;通过业余俱尔部

(Dopolavoro)这个复杂的部门机构,指导工人阶级的业余生活和社会活动,用各种额外的利益补偿工人工资的下降,并在这个过程中“修正”他们的社会主义倾向;它通过举行集会、运动赛事和其他宣传活动制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风气”。

然而权力还是另有所属的:属于传统的国家机构——警察机构也服务于它;属于势力的自治中心,例如私人工厂和教堂;当然还属于领袖,领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点是他得有独自应付这些利害关系的能力。墨索里尼国家高于政党的选择使他独揽多个政府部门大权,这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个人权力的嗜好。从1926年起他就一直控制着内务部,1926到1929年间,由他兼任部长职务的政府部门不下8个。新兴的领袖崇拜因此并没有使人误解:到20世纪30年代,墨索里尼的政权就如一份宣传资料所说的一样,是一人独揽的了。这份宣传资料还声称其政权也是一种“极权政治”——不管是真是假——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论及。

社团国家的理论和现实

意大利法西斯的政治独创性体现在1925至



1939 年间社团国家的建设上,该制度主张革命和社会相统一,在一个依法组建的框架里团结雇主、经理和工人,以保证经济进步和社会公正。法西斯的社团主义引起了海外的真正兴趣。国外的政治学家,尤其在美国,出版了很多专著研究它的运作方式,此外,还有许多政治崇拜者和未来的效仿者,包括英国的法西斯头目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和阿根廷未来的独裁者胡安·多明戈·庇隆。

然而,社团主义并非是法西斯的发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漫长而又复杂,其中有两股源头值得在此一提。其中一个源于 19 世纪天主教关于现代社会的观点。当时,关心社会的天主教徒,如教皇利奥十三世(1878—1903),认为社会本是自然和谐的,因此当今社会不断加剧的社会冲突是可以治愈的,而解决办法是通过“混合的联盟”或“社团”将每一个经济活动单位内的工人和雇主联合起来。比方说,所有的农业人员,从最大的农场主到最穷的农夫都隶属于同一个“社团”,而所有的工厂主、工厂经理和工人都属于另一个“社团”。有人认为,这些社团不仅可以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矛盾,还可能取消作为议会代表制基础的地理选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第二个源头来自工团主义,它强调工会作为革命机构和未来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作用。工团主义者信奉社

团主义,他们摒弃了阶级矛盾的看法,鼓励阶级合作以增加工业生产——这种思想后来被称为“生产主义”,并于1919—1920年被写进邓南遮的阜姆共和国宪法中。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拿来天主教的社团主义和工团主义为自己所用,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利用社团来增加资本家的财富,并提高国家的威信。

社团主义思想为很多人所接受,虽说早期的法西斯主义者对此大都还是懵懵懂懂。1919到1925年里,该思想的狂热倡导者都是原工团主义者,如一直担任法西斯劳工联合会领导、到1928年才卸任的比安基和罗索尼。法里纳奇之流的“党员”希望法西斯国家党能够统治意大利,而罗索尼和法西斯“左翼”却试图通过“国家工团主义”使法西斯国家党与意大利国家融为一体。这将会使雇主们与法西斯工会走到一起来,受“统一的社团”的领导,其目的旨在控制劳资关系,制定经济政策和引导公众舆论。其他的法西斯党员对社团主义看法不一。例如“温和派”博塔伊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方式,能够和平地消除阶级矛盾,刺激生产,通过“管理改革”最终使意大利“现代化”。但是对于像罗科一样的原民族主义者来说,它不过是为了雇主们的利益对劳工进行约束的一种手段而已。

直到1925年,法西斯国家党“左翼”才将这一理



论付诸实施，它取得的成功之所以有限，是因为依然活跃的自由工会的不断竞争和雇主们，尤其是在工业联合会领导下的雇主们不愿意接受“统一的社团主义”。1923年12月工业联合会和法西斯劳工联合会签订了《齐吉宫协定》，为了补偿法西斯劳工联合会放弃它社团主义的梦想，《协定》许诺给它与雇主交涉的特权；结果，雇主们失去了他们的交涉权。1925年1月后，人们对社会党和人民党工会支持急剧减少，使得法西斯劳工联合会得以复苏，促使其与工业联合会再一次签订协议，即1925年10月的《维多尼宫协定》，从此签约双方将对方分别认可为劳方和资方的惟一代表。

在罗索尼和原工团主义法西斯党看来，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统一的社团主义”发展，朝着预想的制度化的资本与劳工伙伴关系前进。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可是大大失望了。原来的社会党和人民党工会现在已经被宣布为非法，它的会员纷纷加入到法西斯劳工联合会，使它的会员猛增，虽然如此，政府对劳资关系的态度却越来越明显了。罗科1926年4月的劳资关系法和1927年大力鼓吹的《劳动宪章》将法西斯工会牢牢控制在国家的手中，其劳资关系制度绝对对雇主有利。1928年，已经有300万会员的法西斯劳工联合会被拆成6个部分，这破坏了

罗索尼的权力基础，有效地消灭了法西斯工团主义这个庞大势力。

1926年7月成立了社团部，表明政府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团主义。在以后的13年里，社团国家跌跌撞撞地成长起来。1930年，博塔伊担任社团部部长，一个颇具潜力的社团议会成立，定名为全国社团委员会。4年之后，早就许诺下的雇主与雇员的“混合社团”终于成立：共有22个社团，每一个表面上都有权在其特定的经济活动范围（比如纺织、谷物生产、商业海运等）决定薪金和工作条件。最后，在1939年，一个全方位的“法西斯与社团议会”宣誓成立，取代了原来垂死的议会。这一切虽说来之不易，但社团国家终于成了现实。

真的这样吗？即使社团主义真的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合理的解决办法，即使有工团主义者的热情和博塔伊等人的努力，意大利人也从没有认真要把它付诸实际。一旦法西斯工团主义开始时的冲劲被磨蚀掉，一旦所有严肃的“以工人为基础的”的法西斯观点的前景被毁掉，政府就会采取措施来维护雇主们的利益。从1928年开始，社团组织内部工人的利益就不是操纵在真正的工人阶级或者是他们选出的代表手中，而是操纵在法西斯官员手里，他们一般——尽管并不总是——服务于雇主们。另



一方面,雇主们不仅能够 在社团内部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还通过保留一些自治机构,如工业联合会等手段,直接与政府交涉。因此实际上,社团主义代表着为雇主和国家的利益管理劳工的一种手段,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尤为如此。

对此,墨索里尼个人负有很大的责任。虽然 1925 年以前他还玩弄着以劳工力量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概念,可是面对工人的压力,或是面对 1930—1934 年真正的社团主义发展前景,只要雇主们一反对,他就退缩了。对于墨索里尼来说,社团主义不过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而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它是一种理论,是大多数法西斯分子都能同意的理论,甚至是可以有条件地参加讨论的理论;是一种明显的社会政治实验,用来赢得外国人对法西斯政权的尊敬;是一个精致的外表,下面隐藏着腐败和剥削,而墨索里尼自己追求的目标却与之背道而驰,20 世纪 30 年代时他更热衷于自己的梦想。

第 六 章

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

法西斯的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在法西斯主义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它都保留着左翼前身的那种口头上反资本主义的特点,在墨索里尼与大商家和农业集团达成妥协后,这一政治特点就无法发挥作用来决定经济政策了。墨索里尼本人对经济学知之甚少,只有一些笼统的经济学概念。1922年他的经济观点和很多法西斯分子一样,只停留在赞同“生产主义”上:至于具体要达到什么目标谁也不清楚。

由于放弃了摧毁资本主义,法西斯只得在传统的经济框架下运作了。法西斯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带有意大利经济的显著特点,这种特点早在战前就显露出来了,即国家与重工业紧密结合、政府有选择地支持某些利益集团和牺牲某些集团,以及由于政府通过税收将个人收入转成工业投资从而导致的消费市场的疲软。

1925年之前是没有“法西斯”的经济政策可言的。由于墨索里尼和财政部长德斯特凡尼实施了自由主义政策,意大利才得以分享欧洲战后的经济繁荣。1925—1926年,在独裁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际收支不平衡和里拉贬值等问题,致使德斯特凡尼下台,朱塞佩·沃尔皮上台,这位工业家兼银行家的通货紧缩和保护主义政策奠定了整个法西斯时代的基调。在墨索里尼个人的煽动下,1927年,里拉的外汇比率被人为地固定在90里拉比1英镑的高比率上——对墨索里尼来说,“配额90”的法西斯宣传关乎意大利人的民族自豪感。政府为了保护重工业和部分农作物产品还设置了高关税壁垒;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间,由于卡特尔和价格固定造成的国内经济的萧条,使得意大利的工业和农业出口部门严重亏本。全面通货紧缩、削减工资和限制自由工会等等,不仅表明了对活跃的国内市场的抑制,而且还印证了法西斯党的社会倾向,即宁愿要稳定,也不愿要灵活变动。

经济政策明显地牺牲掉某些经济部门的同时，毫无疑问地有利于另一些利益集团，它们早在法西斯党当权之前就对政府有影响，而法西斯政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这些利益集团的不断支持：它们包括重工业、波河流域的农业集团以及其他地区的缺乏进取心的大土地所有者。这些农业利益集团是墨索里尼大力鼓吹的“小麦之战”运动的真正受益者，该项运动始于1925年，通过大面积耕种小麦使意大利免除了进口谷物的高成本。

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大萧条迫使法西斯政权采取了新的政策。意大利银行的无能使政府更加直接地干涉经济，尤其是在1933年成立工业复兴协会(IRI)之后，这个管理私人资金的国有公司不断地从私人银行手中接管投资工业发展的任务。1935—1936年的埃塞俄比亚战争，进一步推动了墨索里尼于1936年提出的“自给自足”政策，他认为对于一个战时的国家来说，自给自足是必要的。从1935年开始，在工业融资、原材料分配、国货取代进口材料和直接控制大工业方面，国家的干预越来越多。到1939年，国家已经控制了五分之四的意大利航运和造船业、四分之三的生铁制造和近一半的钢材生产。这种国家干预程度远远超过了纳粹德国，使意大利的公共部门仅次于斯大林的苏联。意大利和苏联的



区别在于,在意大利还有私有部门,而且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蒙特卡蒂尼和希尼亚维斯科萨这两个公司垄断着意大利全部的化工产业。势力很大的私人利益集团可能已经对国家的过多干预产生不信任,更不要说 20 世纪 30 年代末国家调控依然不均匀的经济资源的目的是何等危险。然而这些私人利益集团妥协太多,无法从这个体制中解脱出来,因为毕竟这个体制对他们一直很有利。

关于法西斯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他们与意大利“现代化”的关系,历史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现代化”的问题后面再讨论;但是那些有关增长与生产力的赤裸裸的数字后面隐藏的却是时而故意时而偶然的发展不均衡,法西斯经济政策和管制经济政策的社会优先考虑的事不均衡地影响着意大利社会的各个地区。最明显的受益者早已出现了:倍受宠爱的北部工业家、农村地主和农业资本家,他们的产品受到保护,他们支出的工资按照法西斯劳动政策一减再减。1925—1926 年抑制通货膨胀,而 30 年代末通货膨胀再次出现,在这一时期,很大一部分城市上层和中下层阶级还是有理由感到满意的。国家和政党的官僚机构的扩大为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即使在萧条时期也是如此;教育系统的扩大为未来的教师们提供了新的岗位,为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子

弟提供了学习条件；对劳工组织的管理使劳工获得了一种新的成就感和安全感。不那么幸运的是农村社会的中间层，那些小有产者、佃农和小佃农，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指望着法西斯主义能帮他们改善生活呢。在法西斯的统治下，战后曾有所上升的农村有产者的数量再次回落，而佃农和小佃农的数量却越来越多，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法西斯的宣传使农村生活理想化了，它倡导“农村化”，而不是继续发展城市；然而，法西斯统治下的农村现实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纷纷逃离农村。除了农民远离土地和人口向北流动的问题以外，使事态更为严峻的是意大利南北不断加大的差距，北方在法西斯的统治下持续发展，保持相对的繁荣，而南方则深受“小麦之战”等政策之害，又失去了原来向美国和南美移民的途径，可谓苦不堪言。

法西斯政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有好有坏。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至少从纯物质角度讲，这些政策不像人们以前想象的那么苛刻。另一方面，意大利的工人阶级不再受到自己工会的保护，也无权为自己的利益组织结社，而且，如前所述，从社团国家机器中获利甚微。产业工人相继于1927、1930、1934年被政府降低工资，而农业劳动者的报酬在20世纪30年代初降低了20%—40%。专制政权也没像政



府宣传的那样,使意大利成功地免于 30 年代的大萧条。官方数字承认到 1933 年有 100 万人失业;实际数字肯定更高,数百万人(尤其是农业人口)不能充分就业,职业妇女被迫回家。

然而正确的认识应当是,首先,虽然工资可能下降很多,但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期的物价降低,实际的工资水平还是相对较好的,在 1925—1938 年之间工资下降平均不到 10%(这个数字在一些权威看来已经太高了);第二,如果没有政府投资和公共建设项目的政策,失业率会更高;第三,虽然社团国家本身并没有为工人做什么,但法西斯工会和辛迪加却不仅与社团一道发挥着作用,而且还为他们的成员(20 世纪 30 年代其会员数量增长显著)提供了保护和实惠;第四,法西斯国家增大了给工人的社会保险(失业险、伤害险等);最后,新的机构,如业余俱乐部这样的新兴机构毫无疑问为困难的生活起到了缓冲作用,同时也稍加丰富了工人阶级单调的生活。

极权之梦

根据官方理论和宣传,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权

主义”制度,它不仅要求全体意大利人的被动服从,还要求他们积极参与并全身心投入到民族复兴的英雄事业中来。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浅薄的观察家觉得这一目标已经快实现了。法西斯的宣传是很有说服力的,对不同政见的审查也很有力。对墨索里尼的个人崇拜和它膜拜式的口号——“墨索里尼永远是对的”,“相信、服从、战斗!”——到处都是。法西斯的制服、官员和民兵随处可见。火车——至少主干线上的火车——按时运行。瘴气沼泽——至少在罗马附近外国游客能见到的地方——被排干开垦。连意大利的运动员都必须捷报频传;除了田径运动员和自行车运动员的胜利外,意大利足球队在法西斯统治时期的1934年和1938年两度赢得世界杯冠军,并于1936年获得奥运会足球冠军。

虽然法西斯政治家都认为法西斯政权是极权主义,并且当时的和后来的政治学家也是这样划分的,但它实际上并不符合极权主义的标准。不符合的主要原因在于,早期的法西斯主义由于多变而混乱的本性,需要与强大的势力集团妥协方能强大起来。从1922年到1929年,墨索里尼完成了这个妥协过程。1925年后的法西斯经济政策部分是为了安抚不安的工业家和地主,1929年墨索里尼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妙举——与教皇签定了《拉特兰协定》。这



个协定建立了梵蒂冈国，在意大利境内完成了政教关系的框架，结束了意大利王国与教皇之间长达 60 年的矛盾；对墨索里尼来说，他还确定了自己与保守派势力的联盟，从此得到了无数意大利天主教徒的支持，否则他们会一直三心二意，或者对他采取敌视的态度。

自治的、保守利益集团——君主、工业、地主、武装力量和教会——构成了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个有机部分，使这个政权在法西斯本质上和极权范围上都没有它表现出来的强。在 1943 年之前墨索里尼一直遵照宪法听令于国王，所以尽管有法西斯好战分子的反对——有时墨索里尼自己也反对——他的保守派同盟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依然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举个简单的例子：教会虽然与政府有时会有激烈的争执，但它却牢牢控制着意大利生活中对未来的极权政权至关重要的部分——信徒们的教育和个人的道德。教会的这种影响虽然使极权不彻底，却出人意料地提高了墨索里尼的个人威信。作为回报，他的保守派同盟们为了各自保留的自治权，放弃了所有联合行动的想法，给领袖以无尚的自由，可以随意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

法西斯党在民众中的影响也是不平衡的。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意大利南部地区，法西斯采取

了妥协政策,使既存权力机构得以与其他党派并存。南部地区卢卡尼亚的加利亚诺村因被写进了卡洛·莱维的《耶稣停留在埃博利》一书而得以扬名,它例证了法西斯无法通过与农村生活接触而控制当地政权的失败。城市人可以通过学校、报纸、电台、电影院和法西斯党的各种组织接触到法西斯的宣传,但这些手段都无法渗透到南部农村。然而有一个南方的势力集团,法西斯政府拒绝与之妥协。在西西里,黑手党推行自己的一套管理和“正义”体系,使得它与“极权主义”水火不容,结果被坚决予以打压,但后来的一系列事件证明,它还在地下活动着。

意大利城市的高度活跃气氛也许能说明不同的问题,但事实上墨索里尼只能满足于各方的服从,而无法要求极权所必需的全面的激进主义。至少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政权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其中警察、镇压反法西斯活动的志愿队和法西斯民兵的高压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削弱军事占领区某些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捣毁旧的政治和工会网络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公务员们由于担心被解雇,所以都保持了沉默,尤其是大量的学校教师和大学教授,20世纪30年代他们都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权;1250名教授中只有11人拒绝宣誓效忠。宣传、教育的“法西斯化”、青



年组织的培养、业余俱乐部等等，如果没能培养出更多的法西斯狂热分子的话，也至少确保了社会各方的配合；这些手段虽没能使众所周知的腐败的法西斯党深入民心，至少将墨索里尼捧为了英雄。必须承认，在很多意大利人眼里，政府的成就，经过宣传的夸大后，变得真实可信了：国内的社会稳定，国际上备受瞩目，令这些早已习惯于社会动荡和国际耻辱的意大利人感到欣欣然又非常惊奇。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政府得到了民众广泛的、被动的接受，一位意大利的法西斯历史学家伦佐·德费利切从中获得灵感，称这个时期为“舆论一致的年代”。

有两类意大利人对民众这种被动的一致极为反感。一类是反对派，形成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由个人、小的秘密团体和工会小组组成，他们勇敢但力量薄弱，连反抗的火种几乎都保不住，但终究会发展成为更强大的力量。他们的很多领袖人物都被迫流亡海外，或者像卡洛·莱维一样被流放到国内最偏远的地区。另一种是极端的是法西斯分子，他们觉得政权的成就还不够。这些激进的法西斯分子憎恨依然有权的国王、资本家和教会，敏锐地察觉到法西斯无力填补国家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同时他们还羡慕德国纳粹主义所走的更为极端的道路，于是就坚决要求推行真正的极权政治。1938 年他们得到了回

应,政府通过了种族法——虽然这个国家里只有45000名犹太人(有一些还是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也没有过反犹太传统。其他不满意的法西斯党徒渴望着朝激进的、新工团主义的社会方向迈进,结果总是很失望。其实最能生动体现法西斯主义作为极权政权的局限性的,莫过于它自己的战士永远无法实现的“法西斯革命”的渴望。

第七章

外交与帝国主义, 1922—1936

法西斯主义与外交事务

对于墨索里尼从就任首相到 1935—1936 年征服埃塞俄比亚间的外交行为, 历史学家意见不一。一度风行的左派观点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帝国主义完全是因国内问题而做出的一种未经思考的冲动之举, 而独裁者真正关心的是自己政权的内部统一。最近, 人们越来越体会到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的内在一贯性: 这个政策即使在实施时不走极端, 也总是以扩张为目的的。有一点不容置疑, 就是墨索里尼在制定政策时起到的主导作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外交部长, 即使不当外交部

长时——1929—1932 年外长由迪诺·格兰第担任,1936 年后由他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担任——他依然控制着外交部。开始时,墨索里尼处理外交事务时可能对外交部官员和他们的头脑孔塔里尼有所忌惮,后来就全然无所顾忌了,首先是因为墨索里尼干脆将自己凌驾于各个机构之上,然后是外交部又被部分“法西斯化”了。

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都走常规老路,战后的意大利也不例外。她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地中海、非洲和巴尔干地区,而她的国际地位还要受她薄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限制。战争和战后的处理为意大利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奥匈帝国的瓦解解除了对意大利安全最大的威胁,但在很多意大利人眼里,更多的问题尚待解决:统一亚得里亚海周边地区和建立非洲和中东帝国的梦想还未实现。

作为法西斯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残缺的胜利”的鬼话成为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的一个主题。最初,1919 年的法西斯党的纲领有一点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味道,当然从中也看不出未来会发展成什么;它批判帝国主义行为,强调要通过合法手段实现亚得里亚海周围领土的统一。然而一切随着法西斯主义本身的变化发生了变化。1920 到 1922 年法西斯招募了大量新兵,包括大量沙文主义的战争退伍兵;



邓南遮在阜姆的辉煌为法西斯,尤其是墨索里尼树立了前进的目标;进军罗马之后,随着民族主义者和其他保守派的入编,法西斯的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费代尔佐尼代表民族主义者表达了对意大利国际地位的希望:“我们意大利人喜欢被爱慕,但更喜欢被羡慕和惧怕。”从此以后,所有的法西斯主要派别——原民族主义者、原工团主义者、专家治国论者和黑衫党——都开始倡导“修正主义”的外交政策,他们认为战后的和平协议是对意大利战胜国地位的羞辱,外交政策就是要按照对意大利有利的原则修正当年的和平协议。

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墨索里尼的观点和这些人相同。有两个影响使他放弃了社会主义:一、相信民族主义者和许多原工团主义者进行的、反对“堕落”的法国国际斗争会永远进行下去;二、未来派高歌现代科技、武器和战争。这两种影响不仅对修正主义政策有利,对使用武力实现这个政策也有利。而接下来的鸡尾酒就变得危险易醉了,尤其是让墨索里尼这样性情虚伪、乖张、暴虐又独裁的人来喝。如果说法西斯修正主义外交政策或者帝国主义扩张的“计划”思路连贯、贯彻始终,可能会令人误解,但有一点肯定毫无异议,就是墨索里尼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主要是受到修正主义的鼓舞。

墨索里尼国内政策的军国主义本质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很多政策都用“战斗”这个词来描绘。法西斯的“生育之战”鼓励多生孩子,目的是增加意大利人口,为武装力量提供更多的人力,也为掠夺更多的土地找个好借口。“小麦之战”的目的是使意大利在最重要的粮食方面自给自足。这样,沉湎于军国主义的价值观、法西斯的准军事化教育和法西斯宣传的人们一旦打起仗来,虽然人口增多,也会有足够的粮食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法西斯的工业政策牺牲了出口业,来支持战备生产所必需的重工业。这些政策决不是一个希望长久和平的政府或领袖所能制定出来的。

墨索里尼的外交,1922—1932

不管墨索里尼如何打算,20世纪20年代英法统治的欧洲根本容不得任何进攻性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也没有国际均势可言,虽然后来意大利打破了英法的势力均衡,但当时它无法享受到重要的外交地位。因此,领袖也只能口头上表示对战后状况的不满,同时摆出一副欧洲有影响的“高尚的”政治家的姿态,俨然一位擅长使用高超的外交手腕为意大



利谋福利的政治家。但他无法平静下来。对英法手中的权力强烈妒忌,使他公开批判英法的民主和国际联盟的和平主义。法国的非洲帝国、在东南欧的外交网和她为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流亡者提供庇护这件事尤使墨索里尼愤怒不已;英国控制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和苏伊士运河,最终占据了地中海,也令人不快,但是墨索里尼对英国的妒忌和希特勒一样,掺杂着羡慕的成分。

墨索里尼就任首相的第一年就表现出了冒险家和外交家的风范。既有胆量,又善于谈判,使他超过了邓南遮,将阜姆收回到意大利;墨索里尼与南斯拉夫订立协议,把阜姆同内地隔绝开来,结果导致了当地的经济停滞,但是意大利的爱国者们只顾着欢天喜地地庆祝阜姆的“赎回”,对于那里的经济问题也就充耳不闻了。墨索里尼的另一行动却不大成功,他轻率地占领了希腊的科孚岛,结果在国际压力下,特别是在英国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从该岛撤军。通过这件事,墨索里尼明白了自己还不能与比自己强大的国家对抗,此后的近十年里,他行事小心翼翼,一方面与英国建交,另一方面却暗中破坏法国与东南欧国家的联盟体系,以此加强意大利的国际地位。这一战略的关键在于他与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友好往来,这位欧洲保守党人对墨索里尼的

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在国内的强权统治十分欣赏。张伯伦的宽容使英国默许了意大利在1926年将阿尔巴尼亚变成了它的受庇护国,也由于他的仁慈,使意大利从非洲割据了两小块领土。

意大利一直对非洲和巴尔干半岛垂涎三尺,墨索里尼正是以他卑鄙的、见不得人的手段实施着扩张。将阿尔巴尼亚变成受庇护国不过是扩大意大利在东南欧影响的牛刀小试而已;其他还包括鼓励特别是在南斯拉夫的颠覆运动。1927年他同另一个右翼领导的修正主义国家匈牙利订立条约。这些做法的目的就是取代法国,在巴尔干建立起意大利的势力,实现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周围领土的统一,必要的话可以通过分裂南斯拉夫来达到目的。法西斯在1922—1932年的非洲政策简而言之就是毫不客气地征服利比亚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1928年他还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了“友好”条约。后来的事实证明,友谊是墨索里尼最不想要的东西。

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时候,墨索里尼对正式外交已变得很不耐烦了——部分是由于外国记者和漫画家对他的外交姿态表现出蔑视的态度导致的。在谈论国际问题时他的语言越来越尖锐,从1928年开始“修正主义”成了正式的外交政策。然而在现实中小心谨慎还是十分必要的。无论墨索里尼怎样夸



夸其谈意大利所谓的 500 万精兵强将是多么的机动灵活,意大利的空军是如何的“遮天蔽日”,但真要是打起大仗来,意大利的备战还差得远呢! 1929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使墨索里尼开支过大的军费不得不削减,因此此后的三年里意大利不得不更加小心行事。当时的外交部长格兰第之所以对裁军和国际联盟采取支持的态度,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有什么大政方针的改变或者是他的态度变得谦和了。

1932 年 7 月,墨索里尼亲自兼任外交部长,接着将忠心不二的法西斯分子安插在重要的外交职位上。原来战略上的摇摆状态完全放弃了,20 年代末就已经路人皆知的政策现在更加变本加厉了。墨索里尼对于通过正当外交手段取得的零星成就感到灰心丧气,非洲谈判和巴尔干的外交策略远不如恐怖主义和帝国主义具有诱惑力,又让他感到荣耀。其他方面的考虑无疑也把他推向了帝国主义之路:在国内,法西斯党已经失去了政治作用,社团主义试验也油尽灯枯,但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欲望仍难以满足;同时,与梵蒂冈的关系十分稳定;在意大利,殖民地的抵抗运动都被镇压下去了;在欧洲,英法垄断的时代已近尾声。墨索里尼 10 年前曾向外国人保证“法西斯主义不是用来出口的”,而现在却越发强调

自己在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这将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时代，意大利帝国的命运终将要实现。

埃塞俄比亚

1933年1月，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从此欧洲的局势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件事对意大利的影响一开始还不太明显，主要是因为墨索里尼当时对纳粹主义还不屑一顾。虽然这位德国新当权者对他公开表示尊敬，令他心里十分受用，但墨索里尼对新局势并不满意。一方面，民族主义德国重登国际舞台定会使英国，尤其是法国，不得不更为重视意大利；另一方面，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图谋给意大利曾经同奥匈帝国的东北部边界重新造成很大的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墨索里尼曾一度资助过奥地利保安团的法西斯分子，1934年又开始支持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的天主教政权。奥地利纳粹发动政变失败后，于1934年7月暗杀了陶尔斐斯，为此，墨索里尼派军驻扎在奥地利边境，以示对德国的警告。希特勒这时还无意干涉；这一行动提高了意大利人的士气和墨索里尼的声望。

墨索里尼希望利用新的欧洲势力均衡达到控制



欧洲的目的,结果在 1933—1934 年间由于英法的阻挠而只得作罢。但墨索里尼的另一个预料是正确的,在埃塞俄比亚方面英法给了他更多的行动自由。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准备工作一直在进行着,1934 年 12 月发生在索马里兰和埃塞俄比亚边境的一件小事恰好给了意大利一个借口,局势开始紧张起来。墨索里尼拒绝调停,依靠着英法的妥协,得到了巨大的收获。在 1935 年 4 月的斯特雷萨会议上,英、法、意三国出席,英法只针对着德国的“修正主义”而去,故意不提埃塞俄比亚的事情;同年英国竟然将埃塞俄比亚的一块土地给了墨索里尼。然而在这个时候,除了流血战争以外,已没有什么能满足墨索里尼的胃口了。1935 年 10 月 3 日,战争终于爆发了。随后英法又抛出了《霍尔—赖伐尔协定》以示对意大利的慷慨,在协定中,允许墨索里尼占领足够的埃塞俄比亚领土以确保他对该国其余地方的控制。还未等墨索里尼对此协定做出任何反应,英国国内就已经群情激奋谴责声一片了,迫使英国政府撤回了这项方案。同时,国际联盟还投票决定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但这些制裁看起来就像一场闹剧:重要的石油产品不在制裁范围之内,英控的苏伊士运河依然允许意大利的船只通行,加上德美等非联盟成员国不参与制裁。1936 年 5 月,埃塞俄比亚战争结

束,意大利的东非帝国梦终成现实,此时的法西斯政权达到了巅峰。

征服埃塞俄比亚的事实表明,墨索里尼已经实现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长达半个世纪的梦想。然而无论是大萧条时期产生的问题,还是某些工业集团在非洲的利益都不足以决定埃塞俄比亚的未来状况。那里的殖民地根本就吸引不来法西斯所宣传鼓吹的数百万移民,其实只有几千人到那里定居,而且他们还后悔那儿根本就不值得去;此外,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公共治安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大大消耗了意大利的财力。结果正如有入早就预料的那样,占领埃塞俄比亚反倒加重了国内局势的不稳定。进攻埃塞俄比亚的根源就在于法西斯主义和它的领袖。法西斯主义对骚动、冲突和戏剧化成功的渴求都在墨索里尼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渴求由于人们对领袖“男子汉气概”的盲目崇拜也就变得神圣起来。而其他的独裁者,如西班牙的佛朗哥和葡萄牙的萨拉查则将对个人的崇拜建立在保持稳定和减少骚动的基础上。但是,由于墨索里尼的个性和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特点,这样一种渴求最终对这两者而言是致命的。

第八章

法西斯主义的衰亡,1936—1945

战时的“领袖”,1936—1943

征 服埃塞俄比亚之后,墨索里尼站在了外交的十字路口。无论他的方法如何,他都还没有摆脱意大利外交政策的老路。虽然英国支持对意大利的制裁,但与英国保持外交关系是墨索里尼外交的一贯政策,两者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领袖”的眼界也在改变,没过几周,他就在时任外交部长的女婿齐亚诺的支持下,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对外政策。1936年7月,西班牙的右翼军界和平民发生暴动,反对民选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墨索里尼预感到这又是一个迅速扩大意大利在地中海西岸影

响的好机会,他立刻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战斗,支持暴动一方。这将是一个大赌注:意大利投入的军队和民兵在1937年最多达到了25000人,加上其他兵种,总兵力已超过了7万人,另外包括大量的飞机和各种军火,意大利是输不起的。这场战争一直拖到了1939年3月31日,暴露和加剧了意大利的军事弱点,同时暴乱者的胜利也并没有给意大利带来多少实际的回报。意大利法西斯的部队在瓜达拉哈拉的惨败(1937年3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惨败在相当程度上是加里波第领导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流亡武装的顽强抵抗所导致的,从此,反法西斯战士在意大利获得了双重的保证:一方面反抗斗争之火依然在燃烧,另一方面法西斯的力量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墨索里尼在西班牙的冒险有力地证明了他的外交政策的新理念和扩张方向:“颓废的”民主国家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世纪”。这个新的发展方向完全出自墨索里尼个人的选择,因为英法两个民主国家并不想疏远意大利,面对德国的重新崛起,他们都很急于维系与意大利的友谊。随后,希特勒于1936年3月将莱茵兰地区重新军事化,军国主义的重新抬头反而使墨索里尼相信,他的未来将与德国联系在一起。1936年10月,德国与意大



利订立了轴心国同盟,这是一种松散的结盟形式,由墨索里尼发起并定名,标志了朝着两者以后灾难性的关系迈出的第一步;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墨索里尼对此采取了中立的态度,由此两者的关系就确定了下来。这同墨索里尼在1934年反德国的好战作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两个独裁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1937年9月,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德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让他眼花缭乱,从此在与希特勒的交往中他就一直处于下风,而意大利也在两国关系中降为从属的角色。随后发生的事件再一次强化了意大利的从属地位。1938年10月在慕尼黑大会上,墨索里尼本想再次以欧洲仲裁者的姿态出现,结果却发现在众首脑眼中自己已变得无足轻重了。德国在慕尼黑大会上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功,1939年初,德国又分裂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件事情让墨索里尼分外眼红,刺激得他做出了效仿德国的冲动之举:1939年4月意大利正式将它的“受庇护国”阿尔巴尼亚纳入了自己的版图。1939年5月,忐忑不安的齐亚诺在他岳父的敦促下,与德国签订了“钢铁盟约”,使德国如愿以偿,在这个军事攻守同盟的协定中双方承诺:一旦两国中任一方发生战争,另一方都要给予援助,并且不仅限于防守性援助。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已经决心参战,尽管

德国一心想拉它下水。当德国 1938 年 5 月第一次提出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时,墨索里尼还有所顾忌,因为一方面意大利民众对战争没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 1942 年以前的意大利军事力量还无力参加大战。如今盟约虽已签订,但意大利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东非和西班牙损耗过大,墨索里尼于是宣布,意大利将在 1943 年之前参战。这话从一个梦想建立军事强国并为之奋斗了 17 年的独裁者口中说出,怎么也听不出成功的味道来。

然而,这或多或少都可算是对意大利战备状态的真实的评价,可以看出,墨索里尼还没有完全失去对现实的把握。1939—1943 年发生的大事证明,他在 1938—1939 年采取的谨慎态度是如何的英明,也证明了他后来置自己的警告于不顾是如何的失策。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向希特勒提出了其无法实现的武器和原材料援助的要求,以作为意大利立即参战的条件,结果正如他希望的那样,德国转而接受了意大利保持中立。1940 年春,随着德国的铁蹄横扫西欧和北欧大陆,墨索里尼觉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且还有一些便宜可占,于是开始后悔自己的行为不够英勇,便毅然决定参战。从一开始,意大利的战事就不顺利。1940 年 6 月意军对法国东南边境进行了短暂进攻,接着在 10 月进攻希



腊,但遭受惨重损失,幸亏德国参战才得以摆脱困境。1940年末,德国指派意大利军队进攻北非,结果刚刚开战就被英军击败,直到1941年德国的隆美尔将军接手北非才将战局控制住。同时在1941年的中期,意大利刚到手不久的东非帝国被英国推翻。尽管如此,此时墨索里尼对希特勒依然忠心耿耿,徒劳地把意大利军队派去支持德国进攻苏联,1941年12月,他作出了最最荒谬、近乎自杀式的举动:向美国宣战。1942年11月同盟国开始反击,轴心国在北非阿莱曼惨败,英美联军进攻法属北非领地,此时意大利才感到腹背受敌。6个月后轴心国在北非的力量被消灭,1943年7月9日,盟军在东山再起的黑手党的帮助下,登陆了西西里岛。

墨索里尼的垮台

1936年5月,墨索里尼的政权稳固,意大利的非洲梦也似乎实现了,他在意大利人心中的地位无人能及,达到了顶峰。此后便开始一路下滑。衰退是从西班牙战争开始的,这个轻率的冒险本来就不得民心,拖得越久就越失民心。更重要的是意大利

与德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德国越来越俯首帖耳。这种本来就令很多意大利人感到耻辱的关系,加上1938年德国在布伦纳边境屯兵,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大多数意大利人还很反感1938年的种族法,觉得这就是在盲目地模仿纳粹的种族主义。不喜欢墨索里尼新路线的还有国王,他对自己当上帝国君主心满意足,但对意大利渐渐屈服于德国很是不服。除了对希特勒的个人反感外(希特勒也不喜欢他),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希特勒对“领袖”产生了坏影响。20世纪30年代末,原来信奉共和主义的墨索里尼非常羡慕希特勒对德国的全权统治,他厌倦了宪法规定自己服从国王的地位,一心想要颠覆君主的统治地位。1940年“领袖”掌握了军权,国王对此更加不快,随着战争的继续,他就越发不愿接受墨索里尼了。

战前产生反德情绪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普遍对参加世界大战有恐惧心理。1940年6月意大利人民集会支持政府,但是这一举动似乎包含有很多的不情愿,也看不出有一丝发自真心的群情高涨的迹象。我们可以不无讽刺地说,如果意大利战争进展顺利,墨索里尼就会获得更多的荣耀和支持。结果意大利却连连受挫,这也恰恰揭示了墨索里尼战争谎言的空洞和法西斯主义作为体制的各方面的弱点。一方



面意大利的军队还在苦苦支撑,另一方面德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影响到了交战区甚至是意大利国内。领土丧失以及在苏联和非洲的惨重伤亡都迫使意大利的保守党和部分法西斯分子想努力摆脱与德国的联盟。此外,意大利国内食品和其他用品的短缺,再加上1943年3月爆发的一次大罢工,种种情况使人们摆脱德国的愿望愈加强烈了。

在这样的关头,墨索里尼使自己的政权进一步陷入了危机。可能是由于身心失调的缘故,墨索里尼患上了急性胃病并深受折磨。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了。于是他把一大批马屁精召到身边,对手下人和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的亲戚们的嚣张腐败也听之任之。1943年2至4月间,他将数名法西斯头目降了职,其中包括齐亚诺、博塔伊和格兰第。这一做法把这些本就不满的法西斯分子一下子就推进了墨索里尼的敌对派的怀抱里,敌对派中有温和派、法西斯分子、君主主义者、自由党政客和军警界的重要人物。

盟军攻占西西里使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1943年7月16日法西斯国家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说服墨索里尼,召开了自1939年以来的第一次法西斯大议会会议。在会议召开之前,1943年7月19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意大利北部的费尔特雷会晤,会晤

之前他的政治、军事顾问们就敦促他告诉希特勒,意大利不能再打下去了,结果墨索里尼还是和以往一样对希特勒唯唯诺诺,竟临阵退缩没有说出口,这件事使墨索里尼的地位一落千丈。

法西斯大议会会议在1943年7月24—25日晚间召开,会上墨索里尼遭到来自于两方面的攻击:齐亚诺、格兰第和博塔伊领导的“温和派”希望与德国决裂,他们意识到要想与德国决裂墨索里尼就必须下台;法里纳奇等亲德派则希望进一步巩固与德国的联盟,同时要求在国内进行一场政党复兴运动,实现“纳粹化”革命。会上“温和派”占了多数,经过激烈的讨论后,他们提出了一项动议,对墨索里尼投了不信任票,最终结果是要求国王恢复对军队的控制权。墨索里尼拂袖而去,他觉得这个“顾问”机构奈何不了他。但是国王却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在7月25日的一个会见中宣布解除墨索里尼的职务。等墨索里尼离开皇宫后,他就被有礼貌地逮捕了。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和法西斯主义的 最终灭亡

墨索里尼倒台后,政府就由拥护君主制的巴多



格里奥将军领导,这时意大利已经准备好开始投降了;这一切发生在1943年9月8日,10月,意大利就正式向它的盟国德国宣战了。盟军在9月初占领了意大利本土的南部,与此同时德国也攻克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在意大利领土上同时展开了两场大战:步步逼近的盟军和德军的大战,以及意大利法西斯分和迅速壮大的抵抗组织之间的内战。

墨索里尼倒台时全国民众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之后,意大利各地的法西斯组织迅速瓦解,由此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于是,在意大利的德占区出现了另一种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急于利用墨索里尼来维系意大利民众与轴心国同盟的关系,在1943年9月12日冒险将墨索里尼从大萨索山的监狱中救出。然后,任命他领导建立在意大利最北端的新法西斯政权: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更普遍的叫法(以其宣传总部的位置而命名)是萨洛共和国。

表面上看,社会共和国代表着早期法西斯社会激进主义思想的卷土重来,这种思想曾在法西斯党当年夺权时就被有效遏制了。共和国的当权人士都是些二流人物,是那些一直不得志的激进法西斯分子;它的政治纲领在1943年11月的维罗纳大会上

被确定下来。它是一个狂热的共和政体(如果想一想国王罢免了墨索里尼就可以理解了),并具有反犹太的性质,它一方面保护私有财产权,同时又要实行土地改革和工人、国家共同管理工厂的改革。这种激进思想除了其创始者和许多战后的新法西斯分子信奉外,只是一个空洞的幻象而已。很多法西斯党员拒绝推行它的政策;工业界有效地抵制它;工人罢工抗议;最重要的是,德国人使这个制度丧失了意义。因为理论上,社会共和国恢复了法西斯的“左倾政策”,但实际上它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对纳粹德国的完全服从。当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大谈工人参加管理时,德国人却把意大利工人遣送到德国做苦工;当法西斯民族主义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影响的时候,德国却无视钢铁盟约的规定,吞并了意大利 1918—1919 年从奥匈帝国手里赢得的土地;德国和激进法西斯党建立的社会共和国本来是想使意大利人忠于自己,结果在它的领导下,局势却朝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着:大批大批的人投入到抵抗运动阵营。如果说共和国的纲领表现出了法西斯主义最“进步”的一面的话,那么政府的所作所为恰恰反应出法西斯主义最具“报复心”的一面:这表现在他对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和对党内墨索里尼的“背叛者”的追捕上。实际上,其中只有一位领导人被抓到、受审并被枪决,



他就是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

与此同时，社会共和国控制的地区正逐渐萎缩。1944年8月，盟军攻到了北部的佛罗伦萨，1945年初，盟军和抵抗运动成员一起占领了意大利北部，而此时德国本土的东部和西部也被占领。墨索里尼有名无实的政府被粉碎以后，他试图与抵抗运动组织达成协议，但未获成功，于是他就在德国的保护下向北潜逃。1945年4月28日，他被抵抗运动组织抓住，和情妇一起被处死，其尸体被运回米兰。在那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领袖”最后一次抛头露面了——他被头朝下挂在市中心广场的加油站里，接受意大利民众的嘲弄和唾弃。

第九章

解读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意 大利法西斯主义由产生到灭亡,在欧洲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当人们逐渐意识到它可能是法西斯主义盛行的开端时,争议就更大了。今天在意大利这种争议还在继续,一方面新法西斯分子仍在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墨索里尼,同时意大利左翼人士依然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最邪恶的势力。关于意大利这一段令人困惑的历史,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课题的学者们面对着五花八门的解释难以取舍。下面这些章节介绍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见解。



法西斯主义是道德沦丧的病兆

许多目睹了法西斯主义产生和崛起的意大利自由党人都不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有很深的社会根源的或原因复杂的政治运动。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贝内代托·克罗齐经历了整个法西斯时代，因为他在意大利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所以法西斯几乎从未审查过他。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代表着意大利自由主义自身道德上的暂时堕落。他解释说，从世纪之交开始，自由主义的“自由意识”就受到唯物主义、民族主义和“英雄”崇拜热潮的抨击。这些年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大众缺乏自由主义的敏感，一旦当时的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就很容易被少数法西斯流氓所利用。因此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获取更大的“自由”进程中的一次中断，是一种短期的道德上的“感染”，而意大利很快就康复了过来，重新投入到“自由”这一理想事业中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信仰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宣传家们也都同意克罗齐的上述观点；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有缺陷，而法西斯主义是治病的药方而不是病症。

如果说，自由主义的缺陷促成了法西斯主义的

出现和成功,那是不可否认的。但要是按照克罗齐的说法,这一切都是近期才出现的,而自由主义的“自由意识”是意大利人生活的核心要素的话,那就很值得怀疑了。总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理想化”的解释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推敲。

法西斯主义是“大众社会”的产物

对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普遍的理解是强调所谓“散漫”的大众所起到的作用。这种观点认为,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战争和战后复员使数百万意大利人离开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习惯的地域的、人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全都被破坏了。这些被抛弃的人们茫然无助,不知何去何从,于是就被那些老练的政客和有组织的少数人所利用,去反对统治阶级,结果自己成了牺牲品。这种观点,如同克罗齐的看法一样,也得到了很多法西斯分子的支持,因为他们急于谴责“旧的”政权,而想强调法西斯民同任何特定的阶级都毫无瓜葛,只迎合大众的利益。在法西斯党的眼里,社会经济的高速变化使无数个体彼此孤立起来,是法西斯主义帮助人们找回了自我



和集体的归属感。

跟“大众社会”理论相关的另一种解释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埃里希·弗罗姆和威廉·赖希等心理学家所接受，他们运用各自的心理分析理论来解释个人和大众对法西斯主义感召力的敏感度。不必说，将法西斯主义划分为一种精神病理学症状根本不适合对真实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归纳。最近，一种类似的分析方法得到了一个“心理历史学派”的推崇。

很明显，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确实与上面提到的各种变化有关，也与各政党未能迎合和代表新生的力量有关。同样，如果我们能有条件运用它，那么了解驱使法西斯党徒——无论是首领、活动家，还是仅仅是追随者——的心理力量还是很有价值的。大多数用“大众社会”来阐述法西斯主义的方法——由于深受德国法西斯主义研究的影响——都有一点不能让人信服，就是它的概念：首先，新的大众群体被假定为是“散漫的”、非理性的和受控制的；第二，法西斯主义被轻易地诊断为一种大众心理病症。而我们积累的历史证据说明，至少在意大利，大多数的民众之所以信奉法西斯主义完全是经过充分——当然并不是说正确的——考虑自己的利益，以及强烈的阶级或是群体认同感才作出的选择。

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代表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那些莫斯科领导的追随者们,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一致认为法西斯主义从根源上讲,是由强大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创造出来的,其一旦当权,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工具。他们坚持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已经无力再扩张,于是就创造出法西斯主义来压制工人阶级,强加给意大利一种停滞的、保护型的经济。

确实,法西斯政权与工农业资产阶级之间关系密切,而且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其政权可能根本不会产生。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在不少方面引发了误导——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等敏锐的意大利共产党所意识到的。首先,它忽视了法西斯主义的大众追随者这一点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出现独立于任何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之外的事实;第二,它没能充分解释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偏偏选中与法西斯主义结盟,而不是继续接受对资本主义十分有利的自由主义;第三,它



夸大了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在法西斯国家制定政策方面的影响；第四，它对法西斯统治下停滞的或者说萎缩的经济的描述根本不正确。

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变形

有一种解释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曾经很流行，经过 25 年之后，在学术界又开始有了一席之地，它认为，法西斯主义不过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现象——“极权主义”的一种版本。这种研究方法将重点放在法西斯政权上，而不是法西斯运动或是法西斯出现的时代背景上。该理论的支持者强调领袖和单一政党的作用、政府对国家机器和大众媒体的垄断以及指导性经济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表面上不同的各种极权政府，其相似性远远超过了他们之间的差异。

“极权主义”理论的鼎盛时期是冷战的初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很多美国政治学家用这一理论来攻击西方的新敌苏联，认为它与旧敌法西斯有相似之处。在他们看来，在“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生活非常相似；在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下，人民基本的自由权利——言论、写作和出版权、

集会结社权和政治、工会活动权——丧失了,而经济收益和管理权都操纵在极少数人——富有的资本家、法西斯党或是共产党——手中。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历史学家开始研究起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理论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历史学家详细剖析了法西斯主义运动和法西斯政权的细节方面,想找出两者的区别,而不是共性;历史研究表明,特别是在意大利,极权主义的目的根本没有实现。

法西斯主义是“现代化”的一种动因

近几年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包括多数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和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把法西斯主义与意大利的经济落后以及意大利所尝试进行的“现代化”联系起来。他们将意大利与其他追求快速工业化的独裁政权做了比较,他们发现独裁政权都控制了劳动力,降低了工资并将资金直接投入到重工业中去。尽管有一些经济历史学家认为,意大利的“现代化”改革是失败的,因为墨索里尼顺从了“传统的”经济利益集团,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意大利经济从 1900 年开始发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依然落后,在对这样的社会经济进行“现代



化改革”的过程中,法西斯主义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法西斯统治时期“现代的”工农业部门的生产与投资总值的统计数据以及贯穿法西斯主义始终的“生产主义”潮流都似乎证明了前面的这种论断。但是批评家们也警告我们,不要把法西斯主义制定经济政策时的轻率和即兴当成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不要忽视法西斯统治前意大利工业发展的程度和特点,因为它们影响了法西斯时期的经济模式;不要仅从表面上看待法西斯国家对经济的有效干预,还应该考虑到工业复兴协会和社团国家始终维护着私营集团的利益。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法西斯主义的话,意大利究竟能不能实现现代化;而法西斯能否独自承担起现代化的大任也是无从定论的;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仅从以上方面看待法西斯主义的话,我们就忽视了它产生的方式,以及在它执政 20 年里人类所获得的教训。

法西斯主义是崛起的中产阶级 的一场“革命”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意大利历史学家伦

佐·德费利切就致力于编撰一整套墨索里尼传的工作。在著作中,他提出了自己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在意大利,因为对意大利来说,法西斯并不是一段遥远的历史,它还在影响着人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德费利切解释说,法西斯运动主要是“新兴中产阶级”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的政治阶级之间的权力之争。他认为,新兴中产阶级的精神是“有生命力的”、“乐观的”和有创造力的;它的意识形态是理性的生产主义和社团主义;总之,它是一个“革命现象”。德费利切也承认墨索里尼为了权势而作出妥协,承认后来的法西斯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是“保守的政府”,而真正的“法西斯运动”——在法西斯内部的革命冲动——始终不懈地与这个政府斗争着,直到最后都没有成功。德费利切认为,法西斯政府不是不可避免的。法西斯的保守党同盟本来可以阻止法西斯上台,还可以帮助自由党复兴,只不过他们做了不同的选择而已。他总结说,法西斯的“极权主义”对保守党的利益集团造成很大的威胁,如果不是战争消灭了法西斯的话,它的“极权主义”会愈演愈烈,终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历史学家大多能接受德费利切关于“新兴中产阶级”的作用的论述,但不能接受他关于法西斯运动的乐观性和创造性的观点;批评家们认为,就是这个



观点使他忽略了法西斯主义消极的、残暴的一面，这也是法西斯主义重要的一面。

结 论

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历史文献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能更透彻、更客观地看问题时,才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现象。它出现的基本条件——当然这并不能构成它产生的原因——是意大利政治复兴运动中和运动后自由主义政府不得民心造成的。即使过了很多年后,意大利的领导人依然不能果断地建立一个群众基础更为广泛的政体。1912到1922年,一个更伟大的民主时代到来了,它骤然降临时,意大利正被战争、战后经济危机、大批复员军人、民族感受挫和社会急剧动荡等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其中以社会动荡尤为棘手。如果意大利有一个完备的议会制度的话,这些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可惜自由主义的意大利没那么幸运,她要同时面对社会冲突和“群众”政治时代的到来两大难题。更糟糕的是,在战后“民主的”意大利,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意大利人根本没什



么明确的政治倾向。这些失去政治信仰的人中有两股较大的力量：付出得不到回报又遭左翼分子贬斥的退伍军人及中产阶级，有些像德费利切描述的那样雄心勃勃，正在崛起；而另一些，特别是农村的中产阶级则更像马克思所描述的胆怯的、衰落的小资产阶级。这些意大利人既不信仰传统的自由主义，也不信仰天主教政党或社会主义，正是他们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

法西斯主义掌权不是革命的结果，而是墨索里尼与保守党和所谓的自由主义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很多法西斯主义活动家在后来出现的政府内获得了官职、地位和权力，而他们梦想的彻底的革命却从未能实现过。结果，法西斯政府虽然表面上装得很强悍，但实际上受制于自治的保守势力，它的极权主义十分有限，真正的极权只在“领袖”个人手中。如果说墨索里尼政府在某些方面满足了保守党的利益的话，那也是无心之举，它根本不想，也不必一直服务于他们。20世纪30年代最能影响意大利前途命运的当属它的外交政策，而外交政策的决定权不在资本家或法西斯党徒手里，而只在墨索里尼一人手中。就因为他独揽大权，作出的决定又渐渐违背他的保守派支持者的意愿，才最终导致他的垮台和法西斯主义的灭亡。

附 录

大 事 年 表

1900 年 以 前

- 1859—1870 意大利统一
- 1881 选举改革使选民增加到 200 万
- 1881—1882 意大利在埃及和突尼斯的野心破灭
- 1883 墨索里尼在普雷达皮奥出生
- 1885—1889 意大利占领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
- 1892 意大利社会党成立
- 1896 意大利兵败阿多瓦
- 1898—1900 社会—政治危机时期

1900—1915 年

- 1902—1904 墨索里尼在瑞士
- 1903—1905 焦利蒂的第二届政府



- 1904—1906 墨索里尼服兵役
- 1906—1909 焦利蒂的第三届政府
- 1906—1907 墨索里尼教书
- 1908 墨索里尼开始记者生涯
革命的工团主义者脱离意大利社会党
- 1909 墨索里尼在特伦托
- 1910 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成立
- 1910—1912 墨索里尼在弗利
- 1911—1912 利比亚战争——墨索里尼反战
- 1912 左翼接管意大利社会党
墨索里尼任《前进报》编辑
焦利蒂实行选举改革——选民增加到近 900 万
- 1913 全国大选——天主教人民党和意大利社会党席位领先
- 1914—1915 参战危机
- 1914 战争爆发(8 月)
法西斯革命军成立(10 月)
墨索里尼离开《前进报》，开办《意大利人民报》，并被驱逐出意大利社会党(11 月—12 月)
- 1915 《伦敦密约》签订，意大利参战(4 月—5 月)

1915—1924 年

- 1915—1917 墨索里尼参军
- 1917 卡波雷托——意大利战败
- 1918 维托里奥威尼托——意大利胜利
- 1918—1920 红色的两年
- 1919 法西斯战斗队成立(3月)
邓南遮占领阜姆(9月)
全国大选(11月)——法西斯党失败,
意大利社会党和人民党成为主要势力
- 1920—1922 作为群众运动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 1920 占领工厂(8月)
邓南遮被逐出阜姆(12月)
- 1921 全国大选(5月)——35名法西斯分子
当选
法西斯党与社会党和解失败(夏天)
法西斯国家党成立——法西斯主义成
为政党(11月)
- 1922 教皇庇护十一世当选(2月)
法克塔当选首相(2月)
社会党大罢工失败(8月)
进军罗马——墨索里尼任首相(10
月)
法西斯大议会成立(12月)



- 1923 民族主义者加入法西斯国家党(2月)
修改选举法
科孚事件(9月)
《齐吉宫协定》(12月)
法西斯民兵成立(12月)
- 1923—1924 意大利得到阜姆
- 1924 选举法修改后大选(4月)——法西斯
国家党胜利
马泰奥蒂事件(6—8月)——反对党
脱离议会
执政官叛乱(12月)

1923—1945年

- 1925—1926 独裁统治的法律和制度基础产生
- 1925 墨索里尼宣布实行独裁(1月)
法里纳奇担任法西斯国家党书记(1
月)
《维多尼宫协定》(10月)
- 1926 图拉蒂取代法里纳奇担任法西斯国家
党书记(4月)
罗科推出劳资关系法
社团部成立
宣布阿尔巴尼亚成为受庇护国

- 1927 《劳动宪章》出版
“配额 90”
- 1928 法西斯劳工联合会分裂
与埃塞俄比亚订立“友好”条约
- 1929 意大利与教皇订立《拉特兰协定》
格兰第担任外交部长
- 1930 朱里亚蒂取代图拉蒂担任法西斯国家
党书记
博塔伊成为社团部部长
- 1931 斯塔拉切成为法西斯国家党书记
- 1932 墨索里尼再次担任外交部长
- 1933 工业复兴协会成立
- 1934 混合社团成立
奥地利危机——意大利派兵驻扎边境
(7 月)
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兰边境事件
(12 月)
- 1935 斯特雷萨会议(4 月)
埃塞俄比亚战争爆发(10 月)
- 1936 埃塞俄比亚战争结束(5 月)
齐亚诺担任外交部长(6 月)
西班牙内战爆发——意大利干预(7
月)



- 德国—意大利轴心国同盟形成(10月)
- 1938 德国—奥地利合并
颁布种族法
慕尼黑协定(9月)
- 1939 法西斯与社团议会成立
意大利吞并阿尔巴尼亚(4月)
钢铁盟约(5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意大利保持中立(9月)
- 1940 意大利参战(6月)
意大利入侵希腊失败(10月)
- 1941 意大利失去东非殖民地
意大利加入德国入侵苏联,并对美国宣战
- 1942 阿莱曼战役
盟军进攻法属北非
- 1943 轴心国在北非溃败
意大利北部罢工(3月)
墨索里尼罢免部分法西斯国家党领导(2—4月)
盟军进攻西西里(7月)
法西斯大议会会议召开——墨索里尼

- 被免职(7月24—25日)
意大利投降(9月8日)
墨索里尼从大萨索山监狱被救出(12月12日)
意大利向德国宣战(10月)
维罗纳大会(11月)
1944—1945 盟军挺进意大利
1945 墨索里尼死亡(4月28日)

参 考 书 目

(本文所引著作，若未特别注明，
均表示在伦敦出版)

关 于意大利近代史最好的两本教材是：Martin Clark 的《近代的意大利（1871—1982）》（“Modern Italy 1871—1982”，Longman, 1984）和 Denis Mack Smith 的《意大利：一段近代的历史》（“Italy: A Modern History”，Ann Arbor, Mich.，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nd edn 1969）。

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最新研究有 Alexander De Grand 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Italian Fascism”，Lincoln, Nebr.，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nd edn 1989）；另外，Alan Cassels 的《法西斯意大利》（“Fascist Italy”，Arlington Heights，

Ill., Harlan Davidson Inc., 2nd edn 1985)也相当出色。与此相关的主要评论可以见诸于: S. J. Woolf 在其所编写的《欧洲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 in Europe”, Methuen, 1981, 第 39—64 页)一书中“意大利”(Italy)一文; Adrian Lyttelton 在《法西斯主义》(“Fascism”, Walter Laqueur 编)中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Italian Fascism)。《读者指南》(“A Reader's Guide”, Wildwood House, 1976, 第 125—150 页)以及 Roland Sarti 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激进的政治和保守的目标”(Italian fascism: radical politics and conservative goals)载 Martin Blinkhon 编著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和保守主义分子》(Fascists and conservatives, Unwin Hyman, 1990, 第 14—30 页)。David Forgacs 编写的《反思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Rethinking Italian fascism”, Lawrence & Wishart, 1986), 该书是一本颇有意思的论文集。

研究法西斯主义的诞生、成长,以及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早期阶段的论著有:Adrian Lyttelton 的《夺权。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1919—1929》(“The Seizure of Power. Fascism in Italy, 1919—1929”,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3; 2nd ed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A.



Rossi 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New York, Gordon Press, 1976), 该书提供了一种时下左翼的观点。另外还有几部专题型的研究文献: Donald Bell 的《塞斯托·圣乔瓦尼: 一个意大利城镇上的工人、文化和政治, 1880—1922》(“Sesto San Giovanni. Work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an Italian Town, 1880—1922”,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6); Anthony L. Cardoza 的《农业界精英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1901—1926 年的博洛尼亚省》(“Agrarian Elites and Italian Fascism. The Province of Bologna 1901—192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aul Corner 的《费拉拉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 in Ferra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Alice Kelikian 的《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城镇与农村: 1915—1926 年布雷西亚的变革》(“Town and Country under Fasc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escia, 1915—192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Frank Snowden 的《意大利南部的暴力和上层阶级》(“Violence and Great Estates in the South of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以及他的另外一部著作《1919—1922 年托斯卡纳的法西斯革命》(“The Fascist

Revolution in Tuscany, 1919—19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对于法西斯统治下意大利人生活作全面考察的是 Edward R. Tannenbaum 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1922—1945 年的社会和文化》(“Fascism in Italy. Society and Culture, 1922—1945”, Allen Lane, 1972);另外,专题型的著作有:Victoria De Grazia 的《赞同的文化:法西斯意大利闲暇生活的群众组织》(“The Culture of Consent. Mass Organization of Leisure in Fascist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以及《1922—1945 年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如何统治女性的?》(“How Fascism Ruled Women. Italy 1922—1945”, Berk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Christopher Duggan 的《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黑手党》(“Fascism and the Mafi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Tracy Koon 的《相信、服从、战斗:1922—1943 年法西斯意大利青年人的政治教化》(“Believe, Obey, Figh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Youth in Fascist Italy 1922—1943”, Chapel Hill, N. 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和 Luisa Passerini 的《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体验》



(“Fascism in Popular Memory.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Turin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Roland Sarti 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工业界领导》(“Fascism and the Industrial Leadership in Ital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为我们分析了法西斯主义同大工商业界的关系,同时,论述法西斯主义同梵蒂冈关系的有 John Pollard 的《1929—1932 年梵蒂冈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The Vatican and Italian Fascism, 1929—19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有三本书考察了法西斯主义内部主要的势力派别。其中论述右翼民族主义的是 Alexander De Grand 的《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和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崛起》(“The Nationalist Association and the Rise of Fascism in Italy”, Lincoln, Nebr.,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8), David D. Roberts 在其《工团主义传统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The Syndicalist Tradition and Italian Fasc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9)一书中探讨了“左翼”的工团主义。对于法西斯知识界的研究则可见诸于 Michael Ledeen 的《普世法西斯

主义》(“Universal Fascism”, New York, Howard Fertig Inc., 1972)。

关于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的论述,可以参看 Denis Mack Smith 的《墨索里尼的罗马帝国》(“Mussolini's Roman Empi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Esmonde M. Robertson 的《作为帝国创建者的墨索里尼:1932—1936年的欧洲和非洲》(“Mussolini as Empire—Builder. Europe and Africa, 1932—1936”, Macmillan, 1977);以及 MacGregor Knox 的《墨索里尼脱困:法西斯意大利最后之战的政治和策略》(“Mussolini Unleashed. Politics and Strategy in Fascist Italy's Last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关于墨索里尼的重要传记的最新的英文著作有 Denis Mack Smith 的《墨索里尼》(“Mussolini”, Granada, 1983)和 Christopher Hibbert 的《墨索里尼》(“Mussolin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6)。尽管 Renzo De Felice 的多卷本传记作品《法西斯主义:对其理论和实践的一种非正式的介绍》(“Fascism.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 to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Books, 1977)并没有英文版,但他对法



西斯主义的解读的确令人获益匪浅。此外,还有一种对法西斯主义的解读引人争议,那就是 A. James Gregor 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发展中的独裁统治》(“Italian Fascism and 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另外,本书讨论所及的其他相关资料可以从兰开斯特丛书中找到。其中重要的背景材料可以参阅 John Gooch 的《意大利的统一》(“The Unification of Italy”)。J. M. MacKenzie 的《瓜分非洲》(“The Partition of Africa”),该书把意大利在非洲的利益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国际背景下来分析。有两本丛书分析了当时国际大气候下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它们是 Ruth Henig 的《凡尔赛和约及其之后:1919—1933 年的欧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起》(“Versailles and After: Europe 1919—1933”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同时 Martin Blinkhorn 的《西班牙的民主和内战(1931—1939)》(“Democracy and Civil War in Spain 1931—1939”)讨论了墨索里尼对西班牙内战的干预。最后, Dick Geary 在其《希特勒和纳粹主义》(“Hitler and Nazism”)一书中对墨索里尼的同盟,另一位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作了一番评述。